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26期

【思想文化】

红色记者忽悠了全世界/方延曦

——《红潮小史》启示录之二

【百年国史】

从镇反到肃反/宋永毅

——战争思维下的十年恐怖和杀戮（上）

【评论】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67）

——李锐资料的两国四案/李南央

伤痕的治愈和社会灾难的“他纠”机制/安希孟

【序跋】

他的一生，是观看的——《上班记》引言/文靖

细节中的历史真相——《寒空中的小星星》序/胡发云

【述往】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15）/红云

——1976年，悼念周总理

一位省人大代表的自述——根治西淝水患（上）/张树田

【书讯】

《北京大学文革资料续编》在美出版

【资料】

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资料选登（1）

北大政治系党总支书记张侠《我的意见》（1965年6月8日）

张侠同志给刘仰峤和九人小组的信（1965年6月15日）

【读者来信】

续霜红：谁能告诉我几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和短语？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红色记者忽悠了全世界

——《红潮小史》启示录之二

方延曦

古人说，雪夜闭门读禁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是。新冠封城读禁书，其乐又是古人所不知也。

我读的是程映红先生的《红潮小史》。据说，此书在国内审查了N年，终于不得通过。然而互联网却为它大放绿灯。读此书，让我感兴趣的，是红色记者如何忽悠了全世界。

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约翰·里德和埃德加·斯诺是两个立过大功的美国人。十月革命发生时里德刚好在俄国，后来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成为在西方宣传俄国革命的第一部也是最有影响的著作，列宁亲自为这本书的俄文版写了序。斯诺1936年去延安，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与他彻夜长谈。1938年《西行漫记》出版，把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描写成罗宾汉式的传奇英雄。这本书至今还是中共党史教育的好教材。

并非巧合的是，在古巴革命中，也有一个为宣传卡斯特罗立下大功的美国记者，他的名字叫赫伯特·马修斯。

1956年卡斯特罗带领人马从墨西哥到古巴，在马埃特腊山区打游击。这里远离城市，人烟稀少，而且被政府军封锁，不能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当时巴蒂斯塔独裁政府不但实行新闻封锁，不许报道卡斯特罗的情况，而且散布谣言，说卡斯特罗已被打死。卡斯特罗于是想出了利用西方新闻媒体为自己作宣传的奇招，他派游击队的地下工作者找到了当时正在哈瓦那度假的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

1957年二月初，在“7.26运动”地下组织的严密掩护下，马修斯和妻子伪装成想在古巴购买农场的美国商人来到马埃特腊山区。同毛一样，卡斯特罗把这个美国记者奉为上宾，并和他作了彻夜长谈。卡斯特罗不但深知纽约时报的影响，

而且懂得如何去迎合美国读者的口味。因此他大谈反独裁争民主，许诺说如果他的革命胜利，一定马上恢复被独裁政府取消的宪政民主，举行大选。他还说他的政府将保护私人企业，特别是外国投资。在采访结束时，为证明采访的真实性，卡斯特罗还在马修斯的采访笔记上签了名。卡斯特罗手下的人并给他们拍了照片。

1957年2月24日，纽约时报的星期刊用显著版面登出了马修斯长篇采访记的第一部分：“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青年起义者的领袖，仍然活着并在崎岖的马埃特腊山区英勇地战斗着。”采访记并说：卡斯特的理想是“自由、民主、社会正义、恢复宪法和自由选举”。报道立刻在美国引起轰动。

纽约时报和其他报刊电台对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报导使得美国同情古巴革命的人大大增加，不但帮助了卡斯特罗在美国募捐和收集武器，而且使得美国政府在公众压力下逐步放弃对巴蒂斯塔政府的支持，最终造成了它的崩溃。

然而，卡斯特罗上台后不久，人们就发现他那些自由民主的许诺都是空头支票，于是纽约时报和马修斯开始遭到围攻，认为他们上了卡斯特的当，替他作了义务宣传。美国民族评论杂志登出了一幅漫画：卡斯特罗笑咪咪地坐在古巴地图上，文字说明是：“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记者当年如何报道苏联大饥荒？》一文为读者讲述了一个英国记者杜伦迪如何欺骗读者的故事。

1990年，一个英国女作家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后出版了一本英国记者杜伦迪的传记，书名就代表了这位作家对杜伦迪的评价，叫做《斯大林的辩护士》。

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为斯大林辩护决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罪名，就象今天仍然有左派报纸杂志自命为大洋彼岸中国文革的传人而照样上市行销一样。杜伦迪的名字之所以在今天变得臭不可闻，不是因为他为苏联辩护，而是因为他用新闻记者的笔编造了无数谎言，掩盖苏联的真相，制造出一个虚假的、迎合美国左派和自由派幻想的社会主义理想国。

托洛茨基说苏联在斯大林的铁腕下已经变成了一座疯人院，而杜伦迪却用“俄罗斯灵魂”的玄谈把这个疯人院粉饰成道德修炼的圣地。

公开报导撒谎，私下里杜伦迪却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给英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了一份内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描绘了一幅和他的公开报导完全不同的阴森可怖的苏联集体化图景。

新闻记者通过报道追求个人名誉，就和任何人希望通过职业努力获得社会承认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也和任何职业一样必须遵守职业道德。杜伦迪把报导苏联作为自己谋取名利的天赐良机，这并不错，错的是他为此不顾基本的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

【百年国史】

从镇反到肃反

——战争思维下的十年恐怖和杀戮（上）

宋永毅

内容提要：在毛泽东执政的数十年中，还存在着一场比文革持续更长、杀戮更多的政治运动。那就是自1950年开始，到1960年才结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清反革命的运动”。根据中共领导人的观点：两者是不应分割的“镇反—肃反运动”。该运动可认定的“非正常死亡”的总数为151万—176万人，大大超过了学界估算的文革受害者总数。该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大都是被中共执政后的背信弃义或偏激极左的政策制造出来的。被杀的数百万人，大都不具有其颠覆中共政权的现行性。毛泽东在该运动中创造了“按比例杀人”的处决政策，造成了不是按罪行而是按指标杀人的大杀快杀之风。自此，中共就没有改变他们按比例、按指标、按配额杀人和捕人的方法。

关键词：宣判处决 剿匪斗争 自杀病亡 征粮和民变 按比例杀人

在毛泽东建国后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中，可能中国官方和大多数学者会认为：其时间最长的应当是毛临死前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它总共持续了十年。不过，海外学界也有人以“群众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特征，认为整个文革应当只有三年，即从1966年夏到1969年中共九大就结束了（Chen, 1992）。至于以后连续的一打三反运动（1970）、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1973）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等等，都已经不含“群众

运动”的特征、而是一个个延续却独立的政治运动了。如果我们以上述标准来审视毛氏建政后的所有政治运动，应当说还忽略了另一个政治运动。它也持续了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而且还都含有一以贯之的“群众运动”的特征。它就是自1950年开始，到1960年才结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为“镇反运动”）和肃清反革命的运动（简称为“肃反运动”）。

顾名思义，无论是“镇反运动”还是“肃反运动”，两者的共同点显然都在其镇压和肃清的目标——一个“反”字、即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上。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其具体打击对象的不同。“镇反运动”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下简称为《双十指示》）发布为主要标志，它主要是针对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而“肃反运动”以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7月1日）为发动标志，则着力于肃清所谓的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的高潮大约历时三年多（1950、1951、1952和1953年上半年），按当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1952年9月28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这一运动“给了蒋介石匪帮残留下来的反革命势力，即相当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¹肃反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其高潮是1955到1957三年。²但根据权威文件《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总结报告》（1960年7月1日）的官方说法，这场“全国性的运动”，即“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开始，现在已经胜利结束了”（宋永毅，2015）。换句话说，共进行了5-6年（1955-1960）。为此，大陆学界也有人认为该运动1960年才告完全结束（王小平，2013:182）。

然而，上述论点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两个运动有所割裂，还忽略了它们一开始便是交叉重叠的。1950年的镇反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在其运动高潮的1951年4月2日，在《转发饶漱石关于镇反中清理外中内三层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就明确指示：运动不仅针对“外层”，还要对“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及时加以清理”（毛泽东，1988:215）。这里的“外层”是指社会

¹罗瑞卿，《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载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网络版），剑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2014-2021。

²例如，庞松就持这一观点，可见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页421。

上的反革命分子，所谓的“中层”是指军政机关内的反革命分子；而“内层”，则是指那些暗藏在中共党内的反革命分子。1950年10月19日。罗瑞卿在奉命发动镇反运动的第二次公安会议报告中，就提出了“纯洁内部”的问题。³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中共的第三次公安会议上，就公开提出了“镇反运动的开展与深入，已由‘外层’联系到‘中层’和‘内层’这种内外情况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加以清理。”⁴紧接着，中共中央发出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是《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21日）；二是《中共中央关于在清理“中层”“内层”运动中对共产党员所有隐瞒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处理办法（草案）》（1951年8月25日）。应当说，以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目标的“肃反运动”是和以镇压社会上反革命分子的“镇反运动”是几乎同时展开的。

这两个运动的密不可分性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即“肃反运动”方面来返视。1955年12月16日，“肃反运动”正式开始以后，罗瑞卿在第七次公安会议上做了指导性的报告，他指出：“1955年7月，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机关中又发动了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由于运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进行的，又是在社会上和内部同时展开的，这就使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从现在已经获得的初步战果来看，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内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同社会镇压反革命运动互相配合进行的，这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另一条战线。”⁵因此，中国大陆有学者直接把“肃反运动”的起止时间界定为1951-1960年，这也是不无道理的（王小平，2013）。总之，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1950年的“镇反运动”的一种自然的、线性的发展，两者都是罗瑞卿上面所说的一个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个方面和一条战线。

直接动用国家机器杀人最多的政治运动

³罗瑞卿，《罗瑞卿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罗指出：“纯洁内部问题。对我之心脏地带，一定要搞纯洁，如政治保卫、经济保卫、侦探部门及所有领导者不纯是不行的甚至如负责同志之秘书、警卫员、保姆等，因为他们接近心脏地带，所以也须搞清楚。”

⁴罗瑞卿，《罗瑞卿同志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关于“全国镇压反革命情况与当前斗争任务”的报告》（1951年5月10日），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⁵罗瑞卿，《罗瑞卿同志在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关于“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以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和一九五六年全国公安工作计划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55年12月16日），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把文革和镇反一肃反运动的对比从持续时间上发展到实质内容上，便会对这一运动比文革的更深的残酷性和欺骗性有所领略。这里的残酷性当然首先是指镇反一肃反运动的杀戮人数和屠杀方式。不同于文革中的大多数非正常死亡发生在群众运动或被官方操纵的群众运动中，镇反一肃反运动的杀戮则主要是由中共的国家机器，即军队（军管会或军事法庭）、公安机关或法院直接宣判执行的。虽然至今为止中共不肯解密整个文革十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的总数，但从我们目前所了解一些内部信息来看，由中共的军队、公安机关和法院直接宣判处决的比例并不大。这可能和文革中的“砸烂公检法”运动直接冲击了中共这一国家机器、使其丧失了部分功能有关。然而、一些经中共官方审核批准的文化大革命史中，也曾经零星地透露过一些全国性的官方统计数字。

例如，据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文化大革命中1971年1月开始的全国性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里，直接动用过国家机器抓人和杀人：

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由于当时还在贯彻《公安六条》、杀人权一度下放给省市自治区而省市自治区有时量刑不准等原因，所以不少案子属于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日坚决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被改判死刑，就是典型的一个错案（王年一，1988:337）。

文革中有不少公民常常因他们公开的异议言行而被法办甚至枪杀。当年具体负责平反冤、错、假案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在1979年7月11日中宣部的例会上曾经说过：单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分子，遭到杀害的，有三十万人”（何方，2005:265-6）。这一胡耀邦口述的数字虽然不一定精确，但大体是比较靠谱的，即文革中被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公安机关处决的大约有三十万人左右。笔者当然无法看到关于这一全国性数字的绝密的内部文件，但据我在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时找到的一些内部文件，也可以间接地佐证这一点。比如，197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几个问题

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中，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判处反革命案件二十八万七千余件”。再如，1980年11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转发了省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革命”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

全省“文化革命”期间共判处死刑一千四百七十一人，其中定位反革命罪的七百一十二人，定位普通刑事罪的七百五十九人。1970年“一打三反”中处死刑达一千一百多人，占十年处死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冤杀、错杀的也最多（宋永毅，2015）。

文化大革命中无论就其人口面积，还是运动的激烈程度，陕西省都是属于居中等且比较有典型意义的。该省十年文革被国家机器直接处决的有一千多人，当时全中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被杀30万人的数字应当是比较合理的推断。

就经历了司法程序（不管多么简单粗糙甚至草菅人命）被杀的反革命分子等的数目来看，在中共官方文件中记载的镇反一肃反运动的杀戮人数便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好几倍、甚至可能几十倍。1954年1月14日，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在《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中公布过所谓“杀”“关”（捕押）、“管”（管制）的数字：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人，捕后证据不实而被教育释放的也有38,000余名（杨奎松，2009:217）。当然镇反运动并没有停止在1954年，杀戮自然是继续进行着。据公安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文件《1955年到1958年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纲要》（1955年7月1日）中承认：

经过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1954年紧张的对敌斗争，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自1950年10月10日到1955年第一季度为止，在大约四年半的时间内，全国共逮捕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3,999,899名，杀了765,761名。⁶

⁶ 《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以上的杀人数目是截止于1955年第一季度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在该年年底（1955年12月16日）的全国第七次公安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关于杀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数字问题。从1950年双十指示到1955年已经杀了77万名。我们考虑1956年应该杀15,000到两万名，即比原定计划减少将近一半，1957年还应当杀1万名左右，1958年到1962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杀人要更少一些。⁷

按罗瑞卿的上述“减少”了的杀人计划，即便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总共只杀了15,000名，整个镇反一肃反运动就可能杀掉81万人左右。事实上，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影响，中共又进入了一个乱捕乱杀的新阶段，根据《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8年9月12日），“到1958年5月，全国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6,118,246名，杀了其中罪大恶极的862,236名，管制了1,942,125名”⁸。以截至1958年5月的862,236人被杀计算，不仅超出了我们上述估算的81万人，更把加上以后两年半的运动（1958年5月到1960年）中可能杀戮相加的总人数推向了近90万。无论如何、和我们在上面论述中估定的文革中被司法机关直接杀害的约30万人相比，在整个镇反一肃反十年中被杀戮的人数接近了前者的3倍（达90万人之多）！事实上，被杀者的数目远不止90万。毛泽东自己在1959年7月31日和8月11日的庐山会议上就两次不无自豪地说过：“镇压反革命，杀了100万，极有必要”；“反革命杀了100万”（李锐，2009:197,319）。因此，整个镇反一肃反无疑是动用国家机器直接杀人最多的一场政治运动。

我们在上面追寻和估算的数目仅仅是这两大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中受害者总数的一部分。这一受害者的总体，今天常常被称之为“非正常死亡”。这里还应当包括了被迫自杀、群众性暴行致死和关押中的病疫等等其他的因素。对于文革总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中共从没有公布过任何官方的数字，民间有种种的估计。其中比较有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数据支持的，笔者认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⁷ 《罗瑞卿同志在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关于“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以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和一九五六年全国公安工作计划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55年12月16日），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

⁸ 《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8年9月12日）。转引自王小平：《肃反运动的来龙去脉，1951-1960年》，载《陕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8月，页95。

文革研究专家魏昂德和他的博士研究生苏阳的地方志数据库项目的研究成果。文革以后，中国各地出版了数千本地方志（指包括县的、和“地委”一级）。它们中有公开的版本，也有内部或机密的版本。魏昂德和苏阳教授利用文革后中国大陆还比较开放的出版环境，共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收集了共 2213 个县市出版的地方志。再和省级的数据材料（省志）对照，并输入数据库。他们继而运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进行计算。结论是：文革总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约是“110 万至 160 万人”（Walder, 2014:513-39）。

虽然中共从来没有公布过整个镇反一肃反运动十年中“非正常死亡”的总数，但根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部分内部文件中的数据，可以合理地推算出它绝对不会比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的总数少，甚至超过。第一、中共在 1950 发起的镇反运动的初期，进行过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据来自大陆的研究资料，在这场武装斗争中，中共“先后抽调 6 个兵团部、41 个军部共 150 万兵力”进行。截止 1953 年，中共军队共歼灭“土匪”共 267 万人（郑艳凤、师吉金，2014）。因为这其实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在被歼灭的“土匪”中有多少人被杀一直没有一个具体的数目公布，也没有算在由军事法庭或公检法按程序判决枪杀的上述 90—100 万的被害者人数中。如果我们以战争中 5-10%的死亡率计算⁹，应当是杀了 13.35—26.7 万人。第二、无论是镇反还是以后的肃反中，因为中共采取的是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的形式，如大会斗争、小会逼供信和广泛的肉刑形式，被审查者为避免公开的羞辱和忍受不了私刑拷打而自杀的是一个极大的数目。例如，一份内部材料就披露了广东各地镇反运动以来，自杀的人数急骤飙升的情况：

广东各地自杀现象很严重，自解放以来至今年（指 1951 年——引者注）7 月 15 日，自杀者共 6,772 人。自杀原因：一、在农民运动及镇反运动的威力下，畏罪或企图逃避斗争和惩办而自杀者 3,881 人二、农民运动及镇反运动执行政策上偏差，多采取非法斗争，普遍使用吊打、灌水、灌狗尿等肉刑¹⁰

⁹据研究和调查当年湘西剿匪的大陆作家揭示：当年中共对剿匪中的杀人处决的比例即为 10%，即所谓的“‘剿匪’预算十万人杀一万”。参见《湘西剿匪的血腥本质：一场惨烈的大屠杀》，载美国《文学城》网站，2015 年 4 月 7 日。<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7/4167028.html>

¹⁰《南社严重自杀现象》（5 日简报第 10 号），1951 年 8 月 15 日，载广东省档案馆。

肃反运动也是同样。1955年8月4日，运动刚开始一个月不到，领导该运动的中央十人小组组长陆定一便在十八个省市两个直辖党委和总政治部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的报告中承认：

全国已有512人自杀，自杀的有两种：一种是反革命，他死了我们只损失一些材料，此外再无损失。另一种是不必要死的，现在已经自杀了的里边有多少这样的人不知道。这些人自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领导的不好，控制不严，大家应严重注意这个事。四川成渝铁路的那个副总工程师是个不必要死的人。他工作热心，有成绩，但因为把他放到工人当中去斗他过去压迫工人，剥削工人，就使他们夫妻二人都自杀了。这就搞错了。¹¹

随着肃反运动的发展，各地的自杀事件便大幅度增加，如据新华社记者的《内部参考》中的报道，北京市1955年十个月有1,246起，死亡517人。其中“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484人，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任志樵，1955）1956年年底，在一篇中央十人小组给中共中央关于肃反的秘密报告中承认：全国已经有4,271人自杀身亡。¹²第三，中共在1951年的镇反高潮中搞出了一个劳动改造制度，即强迫大量被羁押的犯人进行最危险最繁重的劳动。名曰“思想改造”，实为残酷地榨取他们的生命的剩余价值。因为生产条件的极为险恶，造成了犯人的大批病疫死亡。1951年12月5日，负责全中国劳改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他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承认：

干部犯政策打骂犯人，利用犯人打犯人，错误的了解：“对犯人的惩罚管理就是打骂虐待。”投入劳改的犯人，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死亡现象。据8月份至现在不完全的统计，即病亡643人，以河北盐滩劳改队的情况为最严重，9,10两个月共病亡211名，现仍有病号887名，至今死亡仍不能完全停止。发生死亡现象的原因：

1. 犯人大批集中，准备工作不充分。如河北盐滩劳改队住席棚，漏雨地下

¹¹ 《陆定一在十八个省市两个直辖党委和总政治部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的报告记录》（1955年8月4日），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

¹² 《中央十人小组关于肃反运动的当前情况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12月7日），转引自王小平，《肃反运动研究（1951-1960）—兼以山西肃反为例》。

潮湿，喝不足开水，结果犯人大批发生痢疾，浮肿，恶性消化不良等病症，加之医药缺乏，造成死亡。

2. 犯人刚出监狱体力衰弱，劳动过度。如云南曲靖等地劳改队，不论犯人年龄，性别，身体强弱，都分配同样的劳动；察省直属劳改队，规定犯人患病三天能好的不准休息等不妥制度。

3. 天气冷的地方已经冻死了一些犯人。川东修铁路的犯人有300名没有裤子穿冻死了14人。延安的犯人187名，因冻而生病致死也是一个原因。大批犯人在监狱中或劳改中死亡，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罗瑞卿，1951）。

为了掩盖历史真相，中共对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中被迫自杀和羁押劳改中被病故的数据一直是严密封锁的。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某些省市的秘密报告中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断来。比如，1954年1月13日，时任湖北省公安厅长的张国武在该省的第九次公安会议上做了一个总结以往三年镇反运动的报告，他第一次透露了该省在镇反运动中的“自杀病亡”的人数：

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年来，经过三个阶段已经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了。全省共计打击了反革命分子171736名（其中杀了48649名，关了79785名，管了43301名），连同自杀病亡的15121名，原有五类反革命分子已有87.9%受到了应有的打击。¹³

因为上述报告不仅有具体的“自杀病亡”的人数，还包含了整个镇反运动中被打击的反革命分子的总数，我们便不难算出它们之间的比率来：“自杀病亡”在整个被打击的反革命分子中所占的比例为大约8%（15,121 / 171,736）。现在我们不妨用《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8年9月12日）中的数据 and 上述的比例来推算一下到1958年9月为止的镇反一肃反运动中有多少人“自杀病亡”。如果我们用8%的比率，得出的结论是：6,118,246*8%=489,459、即在1950年到1958年的8年的镇反一肃反运动中的，

¹³《张国武在湖北省第九次公安会议上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1954年1月13日），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大约有 48-50 万人的“自杀病亡”。荷兰学者冯客曾对 1958 年到 1960 年间的中国监狱和劳改犯的被羁押期间的死亡率做过调查。它们大约是 5%（1958），10%（1959-1960），平均死亡率为 7-8%。这一死亡率，和上述“自杀病亡”率几近相同，从另一个方面做了有力的佐证（冯客，2011:259）。

这样，有关镇反一肃反运动的“非正常死亡”的总数，可以列表如下：

项目	时间	死亡人数	备注
司法部门直接判决	1950-1960年	90 万—100 万人	以 1958 年公安部报告中的杀人总数和对未来两年（1959-1960）的杀人计划数的综合计算
剿匪斗争	1950-1953年	13 万—26 万人	以武装歼灭“土匪”总数 267 万人的 5%-10% 的死亡率计算
自杀病亡	1950-1960年	48 万—50 万人	以 1958 年公安部报告抓捕羁押反革命总数的 7-8% 计算，这里包括了十年中数百万劳改犯的病亡
总数	10 年	151 万—176 万人	

如上图所示，我们仅根据中共自己公开发布的、或在其秘密文件中透露的数据，便可以推断出在整个镇反一肃反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的总数（151 万—

176万人），它超过了文革的总数（110万—160万人）。这里，我们还没有包括了在整个镇反一肃反运动中被宣布为群众管制的数百万反革命分子中的“非正常死亡”，根据上述1958年的公安部报告，他们多达1,942,125人之多。¹⁴在长期的群众专政的暴力之中，这一受害者团体的“非正常死亡”率也是绝不会低的。

上百万的“反革命”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1949年4月25日，当中共大军准备南渡长江，对国民政府军队进行最后一击、进而夺取全中国时。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从属与国民政府的全部官员、军人发布了著名的《约法八章》。其中第5条和第6条如下：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受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者拒不交代者，则需予以惩办。

（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来。凡投诚报到，并将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及予以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亦须受相当的处分。¹⁵

如果按照上述信誓旦旦的《约法八章》中的说法，任何前朝政府的成员，只要不进行现行的和武装的抵抗，即没有现行的反革命活动，就不应当有任何被杀和被关的可能。然而，1950年发动的镇反运动中所杀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否有此类“现行活动”，而仅仅因为他们的“历史身份”，

¹⁴ 《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8年9月12日）。

¹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约法八章》，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26日。

即为前朝政府的成员。我们不妨用上一节所提到的中共的“剿匪斗争”的真相来说明上述分界的截然不同。

从1949年底到1950年,尽管中共已经宣告在全中国范围内成立了红色政权,但是战争在南方的许多省市并没有结束。不少国民政府的军队化整为零,还在一些偏远农村和崎岖山区继续着武装抵抗。这些军队被中共笼统地称之为“土匪”,其实是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国共两党内战的继续和长期扰乱治安的地方匪患的界限。一方面,把国内战争混同于内政中的剿匪,就提高了镇压的必要性,并把责任全部归结于交战中的一方——前政府和军队成员。另一方面,因为匪患往往对地方治安造成持续的威胁骚扰,又容易在民众的眼里等同于现行反革命活动,便一下子提高了杀戮的道德制高点。而中共当局正可以在“剿匪”的名义的掩护下,对根本不是反革命的原国民政府军政成员、甚至是已经投诚起义的人员进行屠杀。由毛泽东直接参与和指示的湖南湘西镇反中的大屠杀就是这样的案例。

1949年至1950年底,中共四十七军等部队和国军的暂编第一军和暂编第二军等地方武装在湖南湘西发生激战。因为当时整个大陆中共执政的大局已定,地方武装中便有不少军官和首领向中共投诚起义了。这使中共四十七军在1950年底到1951年1月,实际上已经稳操胜局。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南局转来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中,发现一个小小的湘西,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处决了4,600多人,相比之下,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杀了200余人。毛泽东于是决定树四十七军为具体的样板,推广全国。他在批示中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本来,四十七军的报告是准备对大规模的杀人收手的,报告说:“镇压匪首惯匪已收到相当效果,应基本上停止,并已指示总结与检查这一段执行情况。”(毛泽东,1987:36-7)但因为毛泽东的直接鼓励,他们只能再大开杀戒:“从1950年12月中旬到1951年1月底,在不到50天时间内,实际已杀2万人”(罗印文,2013)。

那么,中共究竟以哪些手段,杀了一些什么人呢?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著名记者罗印文的调查,有以下五种屠杀的手法,分别针对不同的对象:(一)公审大会后处决。对象主要是选择重大反革命分子,如国军暂编第一军副军长汪援华、永顺县长、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周振寰和芷江警备副司令兼长沙绥靖公署

直属清剿第三纵队副司令潘壮飞等。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全部是在中共的剿匪中投诚了的国军将领，并有中共保证人身财产安全的铮铮承诺。（二）训练后处决。成员都是湘西军区政治部的和平军官训练班的学员，原来都是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投诚起义人员。镇反中被用机枪扫射处决。（三）成批处决。对投诚或俘虏的一般国军官兵。（四）每天处决。对尚关押数万名“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进行成批处决和每日处决。（五）借刀杀人。把一般的投诚“土匪”送上朝鲜战场当炮灰（罗印文，2013）。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上述被冤杀国军投诚人员和前朝官员，在文革后复查的1979-1987年间，全部被平反撤判了。

借镇反为名，对国民政府的前朝人员进行屠杀的绝不止湘西一地，而是全国性的现象。以下是一件1984年中共许昌县人民法院为镇反中错杀的原国民党127军起义军官蔡大同恢复名誉的判决书：

许昌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84. 12. 30; (84) 法刑字第 6 号

蔡大同，又名蔡国彬。男，时年46岁，河南省许昌县苏桥乡蔡庄村人。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由湖北军区捕送我县。同年六月二十三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复查该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湖北省金口镇新沟随原国民党一二七军起义，并编入我五十一军212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宣教干事。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研究决定撤销我院原判决，为其恢复名誉，仍以起义人员对待。

特此判决。

如不服本判决时，（家属）于接此判决书之次日起限十日内，可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1984年12月30日¹⁶

据笔者和现居纽约的蔡大同先生的儿子胡平先生的通话，他告诉我说：

¹⁶原件由蔡大同先生儿子胡平先生提供。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南农家，后来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之后当过县的警察局长、县长和禁烟的督导专员等等。在1948年的冬天，他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而这个部队在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夏天宣布“起义”。因此我父亲也就成了“起义人员”，成了解放军的一个官员。可是到了1950年的镇反运动，父亲就被当成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在1952年4月被遣返原籍。两个月之后就执行了死刑。镇反名义上，你看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它说它要镇压的是那些杀人放火、投毒、打游击、散布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言论、现行反革命活动，是镇压这些人。但实际上它镇压的是那些早就放弃了反抗，而且被当局承诺，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国民党前朝人员。其中还有相当一批像我父亲这样的“起义人员”。当年我父亲他们随军“起义”，当时共产党就向他们宣布了“既往不咎”的政策，还说“起义光荣”，给每个起义人员发了证书。那就写得很清楚，“起义光荣，既往不咎”。在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之后呢，我们家那个时候还被当成军属。院子门口还挂了个小木牌，写着“光荣军属”。¹⁷

在上述许昌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里，值得注意的还有：蔡大同先生是“于1952年4月26日由湖北军区捕送”到该县执行死刑的，而蔡先生正是湖北军区的“起义人员”。军队逮捕原“起义人员”绝不会没有上级的命令。根据前面毛泽东对湘西镇反大屠杀的直接指示，我们不难推断出这可能就是来自中共中央的直接命令。因此，海外学界对镇反运动的研究普遍认为：“被‘镇压’者绝大多数是相信中共的承诺而留下的国民政府政、公、教人员，还有相当多的是国共内战后期参加‘通电起义’或‘接受和平改变’的国民党军队的将士，以及1949年在地方政府任职，维持地方治安一代中共解放军接管的官员，未从事任何‘反革命活动者。”（丁抒，2018:3-4）因为中共这一背信弃义公开性和无耻性，德国学者彭小明则把中国的镇反运动直接称之为“中国的卡廷（Katyn）惨案”（彭小明，2019）。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对中共剿匪达三年之久的原因作一追溯，还不难发现正是中共在南方各新解放区的征粮政策激起了民变和“匪乱”，换句话说，成千上万的“土匪”和反革命是被中共的新政所逼出来的。1949年11月，中共发动西南

¹⁷笔者和胡平先生在2021年9月9日的通话。

战役，仅用了 57 天，就拿下了包括云、贵、川的整个偌大的西南地区。将近 90 万的国军和地方武装都放下了武器，起义或投诚了中共，天下已然太平了。然而，据研究者一历史课题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对后来事态突变的观察：

从 1950 年 2 月开始，西南形势突变。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叛风四起。半年时间西南土匪发展到 65 万之多，是当时全国 105 万武装土匪的一半以上。

1950 年春节刚过，新解放诸区却几乎同时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中共新政权的“匪乱”。不久前还算食壶浆欢迎解放军到来的当地绅民，现在却纷纷拿起刀枪驱赶这些外来的新统治者。中共当局对此始料未及，人员物资损失巨大。为了平定新区“匪乱”，中共当局调动了 140 个师约 150 余万人的兵力，花费了三、四年时间，才得以弭平。共消灭了各种“股匪”260 多万人。中共在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又在打平地方势力中进行了 3 年多的剿匪战争，所花费气力甚至不亚于前者。由此也可以认为，整个“解放战争”的时间不是 3 年，而是 6 年之久（王海光，2019:103-193）。

据王海光教授的研究：“新区大规模‘匪乱’的发生，直接原因是中共新政权不无峻急的‘征粮’行为所致，实际上是新政权征粮引发的民变。”（王海光，2019:103-193）中共的征粮不仅是“不无峻急”，还具有如下的横征暴敛的特色：

（一）云贵川等新解放区早已经向国民政府交了 1949 年的公粮，但中共不予承认，坚持重复征粮。而且还“三征齐发”：先“征借”，后又连续“夏征”和“秋征”。这完全是竭泽而渔，在不少地方还造成了春荒。（二）并不是按国民政府的“赋元”办法，按地亩大小确定粮赋多少。而是用实行阶级累进制办法，使富裕农民和地方乡绅的粮赋达到 100%，200%。他们完全无法负担，征粮自然陷入僵局。（三）为强行征粮，中共向各地派出无数武装的征粮工作队，他们完全按照老解放区暴力土改的模式，对交不出公粮的农民的乱打、乱杀、乱逮捕、乱处罚及酷刑逼征等。这自然也就引发了当地民众的群体性暴力反抗。（四）在云贵川等地强行取消原来的流通货币—银洋，急切地建立贱换贵卖的人民币本位的新的货币系统。

总之，“匪乱”的主体是当地的普通百姓。他们完全是被中共的暴政逼良为匪的。同时，因为中共横征暴敛的征粮政策是全国性的，1950 年春开始的民变

和“匪乱”也是全国性的。除西南三省外，在1950年起始的3个月，各地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抗粮抢粮暴动事件105件，暴动规模累计达到146236人（次），公粮损失超过200万斤。其中华东大区发生49件，中南大区发生51件。¹⁸湖南南县、湘阴，湖北安陆、应城，河南固始，广东西江、东江等地，不断发生抢粮暴动。江西九江有人公开在墙上写反动标语：“朱德毛泽东，做事大不公，穷人没饭吃，富人要充公。”¹⁹甚至在上海郊区，都接连爆发了以“抗粮，反征粮，打倒北方人政府”为号召的暴动和民变，当局承认：“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²⁰至于中共各地干部对富裕农民和乡绅的乱打乱杀和酷刑逼征，连毛泽东和中共的忠实盟友黄炎培（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和柳亚子（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都看不下去。黄炎培在1950年4月两次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书，反映征粮过重、被逼人命等情况。而柳亚子则在上书中，尖锐批评地方干部对农民征粮的蛮横做法实“与绑匪对付肉票无殊”（黄金娟，2019:514）。

除了借“剿匪”为名大规模屠杀已经起义投诚的国军官兵；以其横征暴敛的征粮政策激起全国性的民变和“匪乱”以外，中共在建政初期对深植于中国社会的“会道门”和民间宗教团体的全面取缔和镇压，也是其制造成千上万反革命分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些“会道门”和民间宗教团体常常有和现行政治秩序的不合拍甚至反叛的特点，它们和执政者常常会发生冲突乃至遭到压制。但是，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秘密社团的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的指出：

中共对会道门的镇压铲除与以前的任何朝代或政权相比较，至少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中共是全面镇压会道门。大量的不关心政治、无暴力行为、集中于修身养性成佛成仙的会道门也不例外。第二，中共的镇压手段是最为残酷的，对许多根本无暴力犯罪的宗教信徒大肆屠杀。这一屠杀的残暴性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三十年来，也超过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夏明，2019:514）。

笔者手中有一份《上海市公安局印发华东地区会道门名称的通知》（1953年4月17日），其中罗列了240种要严加取缔的“反动会道门”的名单。而其

¹⁸ 《中央关于防止匪特煽动抢粮的指示》，《斗争》（总）第38期。

¹⁹ 《豫、鄂、湘、赣特务地主乘灾荒困难大肆活动》，新华社：《内部参考》1950年6月12日。

²⁰ 《中央公安部关于新区匪特暴乱夺粮情况的综合报告》（1950年4月10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页340。

中不少团体，顾名思义就很难想象它们会和武装暴乱挂上边。比如“中国宗教联谊会”“青年研究社”“佛学研究会”“孔子道”“佛门道”“道德学会”“孔教会”等等。²¹然而，它们都在中共公安部门的镇压范围之内。按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第八条：“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²²——它们的首领被判处死刑都是可能的！根据夏明教授的推算，“三年镇反处决的会道门成员至少是在14万人以上”（夏明，2019:520）。而其中的很多人都是在组织反抗中共的偏激的取缔镇压政策的“民变”中被消灭的。

即便是对世界著名的宗教组织——如天主教、基督教等等，只要它们不想接受中共的控制，便也会立即遭到残酷的镇压。19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取缔和镇压天主教“圣母军”的运动。这里，“圣母军”的“军”字可能会引发误解，以为这是一个武装团体，其实它的英语是 Legion of Mary，又译圣母御侍团。是一个国际性天主教善会（教友团体），其成员还大都为女性。“圣母军”强调效法圣母精神：“真诚的谦虚，绝对的服从，天使般温和，持续的祈祷，时时的刻苦，无瑕的纯洁，英勇的忍耐，天上的智慧，自我的牺牲，坚定孝爱天主，尤其效法圣母的信德”。²³在中共夺取政权后，梵蒂冈当局对红色中国不予承认，圣母军又强调宗教独立和自由。中共便选择镇压圣母军作为对梵蒂冈报复。在天津、南京、上海等所有重要城市，中共的公安机关都发布了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的法令，并强行要求其成员登记和悔改，否则就逮捕囚禁。偏偏这时仍有一个中国天主教主教——新就任的上海教区首任中国籍主教龚品梅和一批神父——阻止信徒参与批斗等有违天主教教义的政治运动，拒绝在教会内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龚又以主教身份，阻止圣母军成员向政府登记退团，提出“不投降、不退让、不出卖”的口号。²⁴于是，中共便于1955年9月8日晚，采取大规模搜捕行动，将龚品梅主教，金鲁贤、张希斌、朱洪声、范忠良等30多名神父，以及教友，共183人逮捕入狱。事后，龚品梅主教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便是镇反一肃反运动中著名的“龚

²¹《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历史资料汇编（1948—1992年）》，公安部一局编印，2009年，页198-204。

²²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²³见维基百科关于圣母军的条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圣母军>

²⁴<https://zh.wikipedia.org/wiki/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

品梅反革命集团案”的由来。在中国当代宗教史也被称为“九八教难”，即“上海教难”。据悉，中共当局曾把被捕后的龚品梅主教拉到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去认罪，不料被反绑双手的他：

等靠近麦克风的时候，龚品梅突然高呼“基督万岁！教宗万岁！”台下教众立刻响应，高呼“基督万岁！龚主教万岁！”批斗会马上暂停，龚品梅被押回监狱，直到1960年才再次露面，出庭受审被判无期徒刑（英特罗维吉，2022）。

1988年，龚品梅坐牢30年后被批准前往美国入院治疗。1991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公开宣布龚品梅为枢机。此后龚品梅再也没有回过中国。2000年3月12日，他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市安息主怀，享年98岁。

如果说在1950-1954年的镇反运动中中共还只是在社会上的不属于它的团体、阶层和宗教势力中制造反革命，那么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标志着它开始在自己内部制造反革命。革命总是喜欢吞噬自己的儿女，毛泽东和中共自创党建军开始，就有着争权夺利、不断内斗的恶习。在肃反和消灭反革命的名义下，杀害过成千上万的自己的同志。远的有1930年毛为了“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亲手发动的在红军内部的反AB团的肃反运动，激发了红二十军在江西富田发动大规模的兵变。后被镇压，该军自军长到副排长以上的全部军官上千人被肉体消灭（高华，2014:107）。近的有1954年的高岗、饶漱石事件。毛泽东先是暗示高岗向刘少奇、周恩来夺权，帮他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但内斗发生、激起众怒后，他又放弃了高岗。和刘周一起把他们打成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明明是中共党内高层之间无耻的权力斗争，但是在他们的决议里却变成了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新动向：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劳动人民中间享有无限的威信，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只要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地坚持着社会主义事业，敌人的任何进攻就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因此敌人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党，并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中

国共产党的分裂和蜕化上面。这是任何一个具有革命政治常识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爱国分子都能认识的真理。²⁵

遗憾的是：所谓的肃反运动正是在这样荒谬的理论基础上发动进行的。在中共发动肃反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7月1日）中，还提到了影响中共决定发动肃反运动的几个内部的反革命大案，它们是：（1）潘汉年事件，（2）杨帆事件，（3）胡风事件。该指示指出：“潘杨集团、胡风集团的揭露，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开始，而不是这个斗争的终结。正确的估计应当是：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²⁶

更为遗憾的是：上述被引为肃反运动经典样板的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案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中共组织部门自己的复查中全部被认定为错案和冤案。²⁷以毛泽东亲自挂帅批判斗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为例，中共中央与1980年9月29日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周正章，2005）既然当年被视之为运动经典样板的案例在今天都已经证明是无中生有的冤案和错案，那么根据这些样板的指引开展的肃反运动当然也一定会更加谬误百出和荒诞不经。

根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在反右运动中的起草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1957年7月18日）披露，到该社论发表之日为止：

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在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多名。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很难划清敌我界限，而他们自己也将背着沉重的包袱。还应该指出：在1955年—1956年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²⁸

²⁵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²⁶ 《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7月1日），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

²⁷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1980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为杨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²⁸ 《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

根据上述数字，我们很容易算出：在近140万（被“定案”的“81,000多名”加上“弄清问题”的“130多万人”）被立案审查、经群众性的批斗、专案组逼供信，仅5.7%是肃对了的反革命分子，而其余的94.3%都是肃错了的。不过是因为“很难划清敌我界限”而白吃了运动的苦头。而其中属于现行反革命的，只有一百万分之2.7（0.00027%）。即便是被“定案”的“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也绝大多数是错案和冤案。我们前面提到的潘杨集团、胡风集团及其受连累的成百上千的成员当年不也都是包括在里面的吗？

中国大陆研究反右运动的专家朱正先生在批驳肃反运动的成绩时，特别提到了上述社论里举出证明肃反没有搞错的典型案例来做有力的反证：

在胡乔木写的《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社论里，列举了表明肃反运动成绩的十个案例。其中第一个案例是：“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而在《百年潮》月刊2007年第二期上朱元石写的《“胡乔木文集”中应为周维斌加个注》一文中指出：“这是一件冤案。周维斌不是一个叛变投敌的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为革命做了大量秘密地下工作，特别是为中共接收哈尔滨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他的经历：周维斌（1907—1993）辽宁辽阳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加入苏联远东情报组织，1936年赴苏联学习，1937年被派遣回国担任苏联远东军青年突击队小队长。1939年春被日军捕获，以反满抗日罪判处无期徒刑。日本投降后出狱，被推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不久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1946年4月28日苏军撤出哈尔滨，中共先头部队在周维斌等地方干部的配合下及时进驻哈尔滨市。1948年他改任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1955年8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职位上被捕。1958年4月15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减为有期徒刑18年，刑满后在辽宁凌源农场就业。1985年平反。社论是将这一案例作为典型，来证明开展肃反运动的必要性的。朱元石的这篇文章表明，这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由此可见这一场肃反运动是如何颠倒是非，颠倒功罪，污蔑无辜的（朱正，2013:72）。

总而言之，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或者必需的存在，而是在这场“颠倒是非，颠倒功罪，污蔑无辜”的运动中被错误的运动和错误的政策错误地制造出来的。

从“按比例杀人”到“计划捕人”到“肃反大跃进”

2009年，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的访问教授保罗·R·格雷戈里（Paul R. Gregory）出版了一本研究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和大清洗的专著，题为《配额造成的恐怖：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国家安全》。其中提到了不少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在苏联的三十年代的清除富农运动和党内大清洗中的种种残酷而荒谬杀戮的方法和手段。而这些做法在毛泽东发动的镇反—肃反运动中，也完全亦步亦趋、照搬不误。比如，斯大林非常喜欢直接指示他的内务部官员，给他们处决阶级敌人的具体配额。毛泽东在镇反中也同样对上海、北京、南京、湖南、广西等几乎每一个主要省市下达过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具体指标。又如，斯大林为了更多更快地消灭“国家的敌人”，成立了凌驾于公检法以上的领导小组，并简化审判—处决的程序（Gregory, 2009）。毛泽东在镇反中走得更远，直接把处决权下放到了县、区一级。在肃反中，也成立了完全凌驾整个司法系统的“中央十人小组”，还在各省市都建立了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²⁹最后，无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毛泽东的镇反—肃反运动，都大搞群众运动。当然毛搞得更广更深。

然而，一心想当“东方列宁”的毛泽东在中国的镇反—肃反运动中也有他独特的创造，那就是他发明了“按比例杀人”的处决政策。据大陆学者杨奎松披露：是毛泽东在1951年2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第一次镇反运动中的杀人比例：“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杨奎松，2006）这一杀人比例，后来在1951年5月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被总结为：

²⁹1955年5月，中共中央为处理胡风案件成立了肃反领导五人小组。同年7月，中共将其扩充为十人小组。组长为陆定一（中宣部长），副组长为罗瑞卿（公安部长）。成员有：刘澜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萧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梁国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高克林（中央监委委员），李楚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十人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部。中央十人小组成立后，各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五人小组。

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尹曙生,2014)。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杀人的比例,并不是中共中央在“反右倾”的旗号下,于1950年10月10日发布所谓《双十指示》后的处决比例,而是在发现各地普遍出现乱杀乱捕现象后,准备全面收缩时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确立的比例。事实上,毛泽东在《双十指示》后,批发了数十个关于“迅速审讯”“大杀几批”的文件,亲自鼓励各地超比例地大开杀戒。

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湘西镇反,毛泽东在1951年1月17日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四十七军的镇反报告,针对该报告说驻军部队就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反革命分子后,立刻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当时湘西的总人口只有350万。在1950年12月31日四十七军向上级报告已杀4,688人,即已超过湘西人口1%的比例,达到了1.339%。在毛泽东批示鼓励后的又处决两万人,所占人口比例已经高达5.71%了,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所说的“最高限度”的1%(罗印文,2013)。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当时的湘西负责人周赤萍都大吃一惊,因为超乎他的想象。据黄克诚回忆:“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邓子恢问这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黄钟,2014)

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000、4,000人”,“今年可以杀8,000、9,000人为目标”。1月29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从此,很多地方就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直接推动了错捕错杀和大杀快杀之风。

对几个大城市的杀人，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更紧。1951年2月中旬，毛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0,000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其实上海市1950年的人口约为492万，南京市1950年的人口约为96万人。毛泽东指示上海在一年内处决3,000人，已达0.61%。至于南京一年内处决目标设置为超过2,000人，竟然已达2.08%。这两个城市的杀人比例，差别竟然到达1.5%！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杀人比例非但模糊，而且自相矛盾。它介于千分之零点五到千分之二之间，跨度非常之大（尹曙生，2014）。

然而问题更在于：毛泽东的上述比例和思路有什么具体的数据的基础？或有什么客观和科学的根据？我们都无法追溯和考证。专门研究这一“按比例杀人”现象的大陆学者左慈认为，毛泽东笔下的数字和比例历来具有随心所欲和信口开河的特点：

对于建立政权以后的阶级斗争问题，被各国共产党奉为经典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早有指示，毛泽东只是承袭斯大林的观点，但是数字比例的发明权应该归于他。1919年，他认为中国的四万万人口，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1925年，在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他在没有经过细心收集材料和仔细计算的情况下提出中国四亿人口中差不多有一百万是“大资产阶级”，并认定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死敌。在延安整风中，他又规定各地在一百个特务中只能抓五个。唯一有据可查者是在苏区农村调查时得出地主富农占当地人口百分之六的比例。根据目前的资料而言，这种政治运动中数字比例的制定依据很多时候都无依据可查（左慈，2020）。

对于一场涉及数以百万计的人头落地的政治运动，采用如此随心所欲和不负责任的杀人比例来指导大规模的处决，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 Chen, Anita.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 issue 1, 1992.
- Gregory, Paul R. 2009. *Terror by Quota: State Security from Lenin to Stal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33; 202-218.
- Walder, Andrew. 2014.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 - 1971.”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ume 38, Numbers 3&4, Fall/Winter, pp. 513-539.
- 丁抒。2018。“1949-1966 政治运动简解”。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冯客。2011。《毛泽东的大饥荒》。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 高华。2014。“‘肃 AB 团’事件的历史考察”。《历史笔记 I》。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页 265-266。
- 黄金娟。2011。“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三）》。北京：九州出版社。
- 黄钟。2014。“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炎黄春秋》第 12 期，页 34-42。
- 毛泽东。198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毛泽东。198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李锐。《李锐文集：庐山会议实录》（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页 197，页 319。
- 罗瑞卿。1951。“罗瑞卿关于组织 100 多万犯人劳动改造工作的报告（节录）”，（12 月 5 日）。载《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 罗印文。2013。“湘西镇反：惨烈的大屠杀”。《参与》网站（8 月 15 日），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7/4167028.html>

- 马西莫·英特罗维吉。“龚品梅枢机：一个失去光环的圣徒”。，
<https://zh.bitterwinter.org/cardinal-kung-pin-mei-a-saint-without-halo/>
- 彭小明。2009。“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北京之春》杂志，第11月号。
- 任志樵。1955。“北京自杀事件增加”。新华社《内部参考》11月24日。
- 宋永毅。2015。《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网络版。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
- 王海光。2019。“民变和‘匪乱’——中共贵州建政第一年征粮事略考”“土改的前奏曲：中共建政时期征粮问题再探讨”。宋永毅主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香港：田园书屋。
- 王年一。1988。《大动乱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王小平。2013。《肃反运动研究（1951-1960）——兼以山西肃反为例》。南京大学博士论文。
- 夏明。2019。“中共摧毁会道门和极权主义的建立”。宋永毅主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香港：田园书屋。
- 杨奎松。2006。“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第1期。
- 杨奎松。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尹曙生。2014。“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炎黄春秋》第5期，页1-5。
- 郑艳凤、师吉金。201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与构建和谐社会”。《观察与思考》，第8期。
- 周正章。2005。“胡风的三次平反”。《上海档案信息网》（12月26日），
<http://www.dqda.gov.cn/show.aspx?id=452&cid=36>
- 朱正。2013。《反右派斗争全史（上册）》。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左慈。2020。“试析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处决比例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4月号。

【评论】

“状告海关案”跟进 (67)

李南央

李锐资料的两国四案

开年伊始，从女儿那儿回到自己家的第二天上午，门铃响了，我知道必是旧金山中领馆送来“亲切的新年问候”。打开大门，笑容可掬的联邦快递员送过来让我签字的小屏幕，一边用电笔写着自己的名字，一边同他互道：“新年快乐！”

回到工作间打开信封，中领馆第N次为我这个“人民”服务上门的是东城区法院对我的妹妹范茂和我的哥哥范苗诉李南央及第三人美国胡佛研究所及斯坦福大学董事会的《民事判决书》。洋洋洒洒共计八页。

判决书开篇，将东城法院彻底颠覆司法程序的违法行为：开庭传票+起诉状（无原告签字）+参加诉讼通知书同时送达被告，说成是“本院合法传唤”；将被法警押出法庭的斯坦福大学委托律师说成是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颠倒黑白是人民法院/中共政法机构的常态，意料之中。可接下去，判决书在复述原告“诉讼请求”行文中，增加了范茂并未诉求的“李锐及他人写给范元甄的全部信件”，这种“热心”就是非常态了。判决书最后，把原告按母亲遗嘱设定的争议标“我的一切精神遗物”，依据原告父母五十八年前离婚调解书的裁定“个人衣物归个人所有”判给范茂——“精神遗物”等同于“衣物”，则是辱没中华文明了。这还不算，判决书中一处把“遗物”错写成“遗嘱”——将“遗嘱”判归原告。我近年新掌握的词汇中有“脑残”、“脑子进水”，但这两个词无法精准概括这份判决书写手的水准。冥思苦想间，恰就听到江峰在他的节目中用了一个词：“脑袋被驴踢了”。就是它了！

将这份被踢坏了脑子的王晓峰审判长写出的判决书，经由海牙法庭送达美国的第三人，真正是给中国人“长了脸”：咱有钱、咱说啥都是法，我看你美国纸老虎怕不怕？！

2019年二范诉案，我同时收到5月22日起诉状、8月22日参加诉讼通知书，11月12日开庭传票的日期是10月1日，两个月零十天后的12月10日，判决

下达。可谓神速！此前张玉珍诉案，起诉日：4月2日，当天受理；6月25日，7月25日，10月14日三次庭审；11月20日判决。效率较之前者略逊一筹，但判决书先于前者下达，将二范尚在东城法院审理之中的李锐部分资料抢先判给了张玉珍。我很好奇，范茂和范苗会对西城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吗？要不，就再另立一案将张玉珍告上法庭？

这两案中最令人不齿的莫过于原告之一的范苗和代他出庭的女儿范可觅。张玉珍案判李锐全部资料归张玉珍一人所有，二范案判李锐资料中部份归范茂一人所有，两案都没范苗一家什么事儿，为什么如此积极地参与两案的起诉？是什么让为争夺母亲范元甄房产反目成仇、形同陌路的范苗和范茂，又好得穿起了一条裤子，携手将在美国开出放弃遗产继承公证，帮助他们顺利将母亲房产转至各自名下的李南央告上法庭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西城还是东城，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都是中共的党案，参照物即李南央诉首都机场海关案。该案2013年12月25日起诉，至今北京三中院发出18份延审通知，开庭之日无期可待。

国内有一位读者在得知张玉珍和我的兄妹将我告上法庭之后，劝我说：那都是共产党在背后指使他们干的，姨还是姨，哥还是哥，妹还是妹。还有一位读者说：请善待弱小，强弱相济，克己共生也是生物界及人类不断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游戏规则。

需要告诉人们的是，今年的1月15日，张玉珍委托了旧金山顶尖的律师团队应诉斯坦福大学2019年5月24日提交美国法庭“澄清李锐资料归属权”的诉讼。她的美国律师在写给美国法庭的陈述中断言：美国法庭应该按照中国法庭的判决作出裁决。张玉珍背后的那个力量，以一国之力对付一人、一校。

主子放鹰犬出来是要它咬人的，你若反抗，鹰犬必定将你咬死才会松口。把撕咬猎物的鹰犬说成“弱小”，劝告被咬住喉咙的猎物遵守“强弱相济、克己共生”的“重要游戏规则”，以便“走向文明时代”。说这话的人，脑子跟王晓峰审判长一样，是被踢坏了。可叹，这种国人比比皆是。

发生在我身上的两国、四案，争议标都是“李锐资料”，所为目的一个：“掩埋历史的真相”。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为“掩埋”付出了太太沉重的代价，现如今放眼望去：亡国、灭种，已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人再也承受不起任由那些“很弱小、很无奈”的恶狗们，心安理得地坐在腾讯办公室昼夜不

停地替党国秒杀“谣言”之重；中国人再也承受不起任由那些“我得吃饭、我得挣钱，请理解我”的恶狗们抓捕武汉八名传播真相的医务人员，追杀孤军奋战的独立记者陈秋实之重；更承受不起，对人民法院/中共执法机构的助纣为虐保持沉默之重。当今的情势已经十分可怕，习近平不但把中国统的铁桶一般，还用钱左右着世界卫生组织的话语，它的总干事谭赛德居然以习主席的亲切接见而感到荣耀。“中国病毒”在浸染着自己每一寸国土的同时，正迅速地向世界蔓延。

2019年底，国内的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句话：“相信有发声才有真相，有传播才有启蒙，有抗争才有自由，有播种才有结果”。请中国以外听到这篇文章，赞成这位朋友之言的人登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捐款网站，留下你们支持胡佛保存、公开李锐资料，向世界披露中共邪恶的留言，捐上一点小小的心意。守法的美国人需要学会如何应对中共的党法，在中共掐断自由世界的喉咙之前，让我们众志成城，斩断它的魔掌！

【评论】

伤痕的治愈和社会灾难的“他纠”机制

安希孟

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大屠杀。十年后，不是卢旺达人的比利时政府首相伏思达表示歉意与反省：因为他们未能制止大屠杀。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如潮好评。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也向卢旺达人民道歉。安南呼吁世界人民在4月7日为卢旺达遇害者致哀一分钟。

大陆的党国至今没有为文革死难者致哀，十年浩劫中，国家元首、元帅、部长、省长、著名专家学者死于非命多多，未见各国政要、贤达和国际组织为当年未能批评阻止此事表示歉意。浩劫比大屠杀、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在文化意义上更惨烈。难道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阎红彦吴晗翦伯赞李达等人不比卢旺达人民更值得国际社会的关爱吗？

有一篇记述陆定一的文章说：他一是严厉批评文革，把它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并列，指出其手法都是愚弄民众、鼓吹狂热、迷信崇拜等等。（这样说

是完全正确的！人类的“恶”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正如“善”并不分东方西方、中国外国一样）但他同时强调：“希特勒的‘文化大革命’，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是靠外力制止的，即是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的；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制止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二是合理解释文革，视之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成熟的表现。

陆定一先生把中国文革与希特勒的“文化革命”相提并论，完全正确。他认为，希魔与日帝的浩劫是靠外力制止的，中国的文革却是靠中国人民自己制止的。对此，我们应当有所补充：文化革命是由中国人自己发动、自己制止的，这的确可以使人自豪。但若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些人要发动文革浩劫，可能会有另一批人制衡反对。如果美国有一批人上街喊“打倒（美国的）刘少奇”，可能那里会有另一批人同样上街喊“反对打倒刘少奇”。这样，美国的文革可能发动不起来，因而也就不存在平反、昭雪、否定、推翻诬陷不实之辞，也不存在抓“四人帮”（到秦城监狱）或结束“十年动乱”的问题。这似乎是挽救了“四人帮”而不仅仅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因此，自己发动，自己纠正，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当我们集体迷狂地犯错误时，如果别国人民起而批评，如果别国人同情我们的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这同样是人类文明自我纠正。我也想，如果白皮肤、黑皮肤的人发动文革，可能列国舆论会起而批评并为受害者提供庇护。

陆定一先生又说，文革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成熟的表现”。但如果权力得到制约，领袖的权力受到限制，很可能不成熟的领袖与政党也发动不了这样的浩劫——举世各国政府都有其零岁、一岁、二岁……的执政经历，但未必都能有力量搞文革。也有的政党尽管执政多年，已经成熟、衰老、壮大，但至今仍把领袖当作太阳、父亲（好像头上的光环有几十个），搞子承父业，搞嫡传，搞夫妻店（齐奥塞斯库），培养接班人。这个世界上仍有“成熟”的政府在搞个人独裁、兄妹开荒、夫妻作坊、兄弟公司、家族世袭！我不大赞成说我们“年龄”小才犯错误。须知我们常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比美国长），从尧舜禹夏商周就有了文明。我们自己“不成熟”没关系，但“世界已经长大成人”（朋霍费尔），人类已经脱离上帝而独立行走。上帝让人类自行解决问题。人类自身会制止浩劫的发生。

笑蜀在《湘声报》上发表《权力、人性、政治动物》，提到前苏联“政治绞

肉机”，认为它是权力逻辑对生命逻辑的侵害。一架政治机器无法从根本上自我纠正，也许外力能使机器变好！文革是体制的必然产物（似乎有些地方必然地发生如此清洗和浩劫）。看来文革有其必然性，而人类当时缺乏纠错的机制。

因此，把文革归咎于四个人，归咎于“不成熟”，只能使全民缺乏自我反省，这正是民族的悲剧。说实在的，在文革中我们这一代红卫兵比毛泽东及中央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1966年8月6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行为。8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战报》严厉谴责打人抄家以及对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势力论处的行为，要求红卫兵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首都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在其活动的短短一个多月陆续发布了十几个通令。这些通令对保卫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社会秩序，反对武斗，以至保护民主人士，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西纠”竟有如此辉煌的战斗历程！文章简直是在深情地回忆文革红卫兵火红战斗岁月，甜蜜而温馨。然而文章对“西纠”的评价太高了，似乎我们年轻的娃娃们当时是在“纠正”文革错误！红卫兵和纠察队都是那时娃娃们违宪的发明。我不禁要问：他们捍卫和宣传的“十六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它难道不是“红色风暴”的风源吗？它难道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吗？全面武斗难道不正是“十六条”的产物吗？“西纠”是有权发布通告通令的国家机器吗？它有什么权力对保卫党政机关，保卫国家机密做出规定呢？这本身是全面混乱、全面内战时期的怪胎，然而却得到喝彩！据我所知，“西纠”与“联动”，实即一具有错误性质的群众组织。我认为，我们应当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而不是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文革前，那时的人们只知批判别人，结果后来自己也受到清算。

看来，“西纠”乃是当时一批搞个人崇拜的幼稚的高干子弟和娃娃们为社会添乱且制造伤痕的人。在当时真正纠正文革的人为数甚少，且难逃整体背景上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张志新）。我现在不知道当时人类社会和国际人士是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纠”——这想法太奢侈，太天真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被允许设想当时人类的“自纠”和“他纠”的。

唐山大地震若发生在今天，开放的中国会邀请各国共同抗震救灾。同理，若是在今天发生文革，会有世界人民共同纠正。这就是人类的“自纠”机制，也可以叫“他纠”机制。因而，情形很可能是我们对文革的教训并没有真正加以吸取，并没有真正“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从根本上铲除文革发生的社会条件，有赖于我们融入国际社会，树立环球观念和世界人类一体化思想，有赖于政治民主与人权保障，有赖于我们与国际社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国际社会没能大声呼吁制止浩劫，整体沉默，集体消音，是人类原罪。

欧洲中世纪农奴若逃亡到城市满一年零一天即可获自由。民主与法制为政治逃亡和政治庇护开了一道光明之门，成为真正的“逋逃藪”（指藏纳逃亡人的地方，似乎中国今天犯罪之人逃亡并不加罪）。这是国际社会与人类共同体的共识，即“自纠”或“他纠”机制。各国文化都不简单地以“逃”为罪。逃难、逃荒的逃避行为乃是一项天生的权利与本能。今天我们对乞讨者已不一律抓获、遣送，而采取救助办法。中国自有洋传教士进来，就有了对灾民、难民的救助措施。当然，这不是说对负案在逃的官吏可以庇护藏匿。各国对大贪官、大毒梟通缉合捕，乃是“他纠”或“自纠”的另一种表现。不过对政治流亡者（如对列宁、对初期国际共运活动家、对巴黎公社的流亡者）之庇护，至今仍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人类的“自纠”。汉文中的“逃秦”，即指逃避秦火，犹言避乱，天经地义。“老夫逃世久，坚坐听阴晴”，有隐居之意。我们今天为国际社会未能给刘少奇提供保护，深感遗憾。☐

【序跋】

他的一生，是观看的

——《上班记》引言

文靖

“六一”那天，何老轻轻的走了。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挥一挥衣袖，变成一朵无声的云彩。

——文靖

《上班记》十几年前就写好了，因为聊的时候都混在一起，和《上学记》几

乎同时完成，最多只差了半年。何老嘱我先别发表，“因为有的人还活着，说了会惹麻烦”。的确，《上学记》给他惹了一些麻烦，某甲、某乙不依不饶。何老天生从来就不喜欢与人争，听了只是点点脑袋，用一种“我也可以理解”的语气，说：“冯友兰的姑娘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不过，从来他没有公开回应，就算别人敲锣打鼓吵翻天，他也任他们说。

这就是何老，一位最谦和的老人，他有他的坚定。一生远离政治、远离纷争、远离一切世俗功利，他只躲在自己的书房里，做份内的事，读自己感兴趣的书。所以，他永远都不会被外面的世界乱了心性，正如网友说的那样：“他如同一个小孩看街景一般，这个街景是喧闹的、丑恶的，而他是一个安静的孩子，只是隔着自家的玻璃窗看两眼。这个状态是他一生面对时变世变的态度，始终如一，所以可爱，所以难得。也正因为此，几十年间的世态浮沉在他眼中就像一个鱼缸，金鱼海藻一目了然。”

我很喜欢这段话。所有我感受到的美好，你们也都感受到了，你们都是解读密码的精灵。他用一生默默坚守着的那份美好，终于荡漾开来，溅起了更多的涟漪。

我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一生满足于旁观者的角色，不过是浮生中一个匆匆的过客。这就像演戏一样，何必人人都上台表演，做个观众不也很好？正如《浮士德》中灯塔守望者一边唱一边说的两句话：“Zum sehen geboren, zum schauen bestellt.”³⁰（我的一生就是来观看的。）

如果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观者，能够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够了。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是何老对自己的定位，但我想说：那个汹涌、凶险的大时代从来没有摧毁他，他的内心始终都在追求崇高，是大时代在这“小人物”前败下阵来。它，配不上他。

³⁰ To see I was born, to look is my call.

一

关于这两本书的缘起，常有人问，说了你们也不会信的。

2001年我还在读研究生，一个炎炎夏日的下午，骑辆二手自行车晃到了照澜院。那是片生活区，就在清华“二校门”的南边，银行、饭馆、超市、书店，还有各种修理，面积不大，啥都有。再往南是教师住宿区、清华附小，梁思成、林徽因等等住过的小洋楼就在那边，很漂亮。那天我去照澜院邮局，好像是投稿。因为我总有一点心病，以为满怀虔敬送出去的才最保险，随便扔到邮筒里的都不会被刊用。可巧呢，碰见了何先生。

那时候何先生已经不教书了，偶尔做一次讲座，我慕名去听过。讲的什么全然记不得，大概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他最常常讲那部分了，而且我觉得，他一生的精神就源自那里。何先生属于老派的那种讲法，用今天“张牙舞爪”的标准，未必精彩。他的声音不高，也不摇头晃脑，不属于特煽惑的那种，但一字一句都很有条理。从来没有一句话翻来覆去说好几遍，那样的人很多，一般都是因为脑子赶不上嘴。何老不介，他从来不在别人的耳朵里打草稿。这样的老先生，学问好，人也和善，绝对不会为难学生，很阿弥陀佛的。

那天下午，何先生也在邮局，正全神贯注的黏一个信封。他干什么都认真，样子可爱极了。忽然我就想吓他一下！猜他的耳音不好，或者好不好的都没所谓，反正我就想吓他。学生要顽皮，是谁也拦不住的。几步上前，对着他的耳朵大喊：

“何先生好！！！”

他怔住了，看来真的被吓了一跳，大概以为我要抢他的胶水。抬起头，从老花镜的上边定神看了看，确定只是个不认识的学生，赶紧点点头，说：“哦——，你好，你好。”那一刻，他也是认真的。

我见过很多老人，有的越活越嚣张，就像一株会移动的仙人掌，全人类都欠揍一样。有的越活越精明，有的越活越糊涂，有的越来越好为人师，有的越来越冷漠，把自己变成了沙漠里的胡杨。但是何老，把自己活成了老神仙。他的内心是充盈、饱满的，却从不事张扬。他不会打扰任何人的，跟谁他也不较劲。他有一种天真，而所有的“天真”都是一辈子修成的正果。

那天我本无聊。自从唸了哲学，经常我会处在一种无聊的状态，像一颗扎不下根的蒲公英。我把我的感受写成诗，但我怀疑那些邮筒其实是粉碎机，把我的

句子都吃掉了。

那天的我照例无聊，因为邂逅了何先生，还吓了他，一瞬之后的心情大好。他的那种不紧不慢、不慌张，和我周遭的一切都不一样。世界像没头苍蝇似的紧忙活，他有他的镇定，用一种“你不烦我、我不烦你”的方式去活。温和的霸气，最温和、也最霸气，这一点我特别欣赏。但我还做不到，于是，他在我心里就变得不可磨灭了。等又过了些年，在我更加迷惑、沮丧、更找不到北的时候，就又想起了何先生，以及照澜院的那个下午。

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吧，牧师不老那么说：谁把谁送到谁的近前。

我愿变成那样的人。这次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愿去聆听、我愿去修行。在他的故事里，我登上了我的方舟。

唉，说了你们也不信，因为它听起来毫无意义。

但其实，所谓“意义”都是后添的。包括历史上的大事件，几乎所有的缘由都乱成一团。只不过那些有话语权的人，为了自诩，或者痛打落水狗，才事后扒拉扒拉，挑一个最耳顺的理由说给你听——然后，你就信了。因为你希望历史是逻辑的，扬善惩恶、圆满的，所以你就好糊弄。曾经我在广播电台做嘉宾，一个不停插播天气、主要给出租车司机听的栏目。当被问起《上学记》的机缘，我讲了那次夏天的邂逅，真自讨没趣。因为他们根本不以为然，才不要听什么“胶水”“信封”之类。他们需要个硬邦邦的，扔到地上能听见响儿，有着历史感、道义感的理由，一个可以高举的“大拳头”。他们需要“意义”，那种有劲儿的东西，用以针砭时弊、批判现实。

我编不出来。

只能说，那是一种直觉，我乐意。何以我的感受就那么不值钱，非得舍近求远，在历史的长河中捞一个什么什么？还必得深刻、有启发性。嘿，我不也万物之灵？

何老有一种高尚，是无欲无求之后的高尚。他有一种智慧，是扪心自问之后的智慧。这是岁月打磨出来的，却在瞬息之间就能感觉到的“真”。所以，虽然我和他的差距那么远，他的学养、他的经历，我都攀不上。但总觉得很近、很亲切，那是一种心灵的距离。抛开一切浮华、喧嚣，我不要一切花衣裳，皇帝老子的话我都不想听。我只想搬个小板凳坐在他边上，这不就是最充分的理由？

至于何先生，他家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什么时候打扰都欢迎。他就像个钟摆，奉茶一杯，到点儿开讲。

二

书像一面镜子，你心里有什么，就会寻找什么、看到什么——其实，你看到的是你自己。“一言以蔽之”太武断了，若一定要用几句话谈一本书，我也未必能说得更好，只能代表我自己。

在我看来，《上学记》是一本谈“幸福”的书，难以忘怀的美好。在“万恶”的旧社会，生活困顿、战火连天，对政府透顶失望。但有一批最优秀、最漂亮的年轻人，在简陋的教室里，听满脑子学问、半肚子牢骚的先生论古今。从未放弃，而且“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正是那份遥远的、模糊的，却又十分肯定的幸福感，让今天焦躁的我们羡慕不已。

而它的续篇《上班记》讲的是“荒诞”，人间“大不幸”。春风得意的新社会，自信满满、干劲十足。但在理想主义旗帜下，以革命的名义，狂刮“瞎指挥风”（毛语）。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做尽了荒唐。深深浅浅的，它释放了人性最卑劣的恶，无辜的人死去，真诚的人不得活。

这段离我不十分遥远，尚属于“活人”的历史，经常也听老人们讲。很多事不是说说就能了的，而是扎在了他们的肉上，家家都有掩不住的伤心史。掠夺，“共产风”之下的掠夺，几代人的财富忽然就归零了，重新洗牌。天天、天天政治学习，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汇报思想，不问就里表忠诚。于是，属于“真”的越来越少，最终都变成了虚伪，各个都猴儿精了。“觉悟”有先有后，浮夸、造假的人被大大奖励，忠于良心、讲真话的被打入另册。人祸终于造就了“天灾”，鲁迅说“吃人”只是比喻，却在所谓的“灾荒年”屡屡发生。好不容易缓和了几年，却是新一波、又一波的瞎折腾。“忠字舞”把人都跳傻了，没有世外桃源，没地方可以躲。如果你不选择做一个恶人，就得活在“老实交代”的恐惧中。

和别人一样，何老也讲苦难、饥饿，讲不公，但他总用淡淡、淡淡的语气，更多的是反思。所以在他的叙述中，你只能读到淡淡的悲伤，然后又忍不住要笑。包括以后的人看这段历史，它既是残酷的，也是滑稽的。大干了那么多年，“甚

至吃一块豆腐还要限量”？在“革命”的、“理想”的名义下，处处是荒唐。可以说，建政将近三十年革命不断，却是一场场淌着人血的荒诞剧。彻彻底底与愿违，完全不是料想中的“天堂”，而是人间地狱、“修罗场”。那么，当时代碾过每一个人，何以坚持你的底线？何以选择自己的路，何以解脱？

走访何老之前，我还是个“小红粉”，很小很小，自己都没感觉。因为很多东西天天灌，二十几年后，它必然进入了身体，成为你的一部分。

比如，我也学了很多年的音乐，程度不算低。但在我琴弦上，门德尔松的e小调没有雍容华贵，而多了一点儿杀气腾腾的革命腔，以及腰鼓、红绸的“村气”。没办法，这才是你耳濡目染、浸到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变。曾经我给何老拉过一次琴，以为他会很开心。结果，当天晚上他就进了校医院，因为胸口疼，我总以为和我不无关系。

再比如语言。永远我都缺少真正的优雅，没有细流般的平和，不能够温柔，而总硬锵锵的，就像《新闻联播》，老那么有战斗性。它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烙在民族性里的软特征，不经意间代代传。现如今，长袍马褂没人穿了，拱手、作揖也要灭绝了——那些被割裂的传统，已经被彻底砸烂了太多年，硬要敛吧敛吧往回捡，总觉得假模假式。总之，恢复旧时代的传统是一件很难的事。但，至少在看不到边的n多年里，哪怕你站在反方，毛时代的影响都不会彻底消失，一张嘴就露馅儿了。

那时候的我刚上班，刚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忽然就赶上了单位的一次革命。简言之，就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纸媒、知识阶层内引起了轰动。虽然我也位列“群众”，但对于这事的开头、结果，以及背后的那个整体，总有点“大吃一惊”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小受了很多年的教育，都是服从这个、服从那个。更高一层的人更智慧，最高的就是太阳，永远放光芒。为了追求一个人类的什么什么宏远目标，你要忽略自己、成全高邈。“为……伟大理想奋斗终身”，你要去“奉献”，牺牲个人而让干嘛干嘛。因为你是渺小的，你得听话。

忽然有一天，你发现，那些都是虚！妄！

不要说那些最高的人，就是离你最近、只高一点点的人，原来都是有私心的。嘴里说着振振有词的漂亮话，心里不定打着什么小算盘，甚至是阴沟里的腌臢。等你终于发现了这一点，它和你一直以为的不一样，就会对周遭的一切产生普遍

的怀疑。那些看起来有雄心、有抱负的人，那些慈爱、慈祥的，让你忍不住交心的人，在他转过去的时候，下一秒又变成怎么样的一张脸？从来我都没经过那样的训练，分不清呢，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些是屁话？到底谁才可以信赖？

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假设：每个人都像天使一样，或者植物一样的心无杂念。没有私心就没有“恶”，这是最起码的。如果不仅仅是活着，还要完成人类的一个这样、那样的共同理想，就得再加一条：绝对忠诚。但是，你忽然发现人心的不可测。那个完美的终极理想，就算每经一道手只打了九折， $0.9 \times 0.9 \times 0.9 \times \dots \times 0.9$ ，传到你手里的时候，也所剩无几了。

我们不是天使，也不是白菜，不可能没有私心。我们不是蚂蚁，不是蜜蜂，它们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忠诚，甚至牺牲了“性”以成就总体，早就实现了“共产主义”。但我们是人呢，勉强去做蚂蚁、蜜蜂，“无私”最后就变成了“无耻”。所谓的“忠诚”都只停在嘴上，在一个巨大的高帽子下，人人挂着一张假脸，最终成就的都是两面派。一张人类最宏伟的蓝图，近看布满了蛆虫，细细碎碎的全都是欺骗。被压抑的私欲从没停止过横流，无耻之徒在狂欢。

等你发现了这一切，就觉得：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怎么忽然，就没了？你以为是花岗岩的，轰然坍塌碎了一地，只剩下升腾的齏粉、你惊愕的脸。

我也后知后觉，属迟钝的那一类。原本读的工科，但一直以为，只有一样技术值得追求：如何把核弹头、可乐瓶子还原成空气、土壤和水。现代化，最终就是一个垃圾场。不想跟他们一起祸害地球，我就赖在校园里不走了，改学文。而且是哲学，一门高处不胜寒的学科、万种学问的妈，几乎没有任何前途，所以也没什么人读。我还挺得意的，以为自己快成仙了。却发现，搞哲学的也不尽是聪明人，有的很俗气、有的很愚蠢，甚至更愚蠢。后来总算毕业了，决定不问就里随一回大溜，别抬头。结果就像高台跳水，终于鼓足了勇气，却一头栽到了水泥地上。

一直我都心存幻念，以为成年人的世界也爱憎分明，钉是钉、铆是铆，鹿就是鹿、马就是马。不是埋怨我的原单位，我社乃业内翘楚，最顶级的。但正因为这样，让我觉得哪里都一样，别处甚至更糟糕。全部是利益之争，钩心斗角罢了，哪有那么多的“共同”，还“理想”？切！

正当我的心情无处着落，万幸呢，又遇见了何先生。

何先生说：“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西南）联大那七年……”这话说的，多唸几遍就嚼出了悲伤。所以，他的故事、我的心事，他的过去有我可以预知、借鉴的将来。而且，他有一种我非常向往的，不只是学问，不只是人品，往他身边一坐我就觉得心定。包括他的北京腔、他的那种淡然，听他讲话，你会觉得很疗伤：唉，没什么大了不得，什么都可以放下，一切都能一笑了之，世界荒诞不是你的错。

那时候的我还年轻，没人像我这么有闲工夫，也没人这么较劲，因为我的内心充满了困惑。刚从一个看似光芒万丈、实则高估了人性乃至一切皆为虚妄的信仰里爬出来，我渴望着换一个视角，重估人的价值，渴望着解脱。所以对我来说，走访何老这事不像一件秋天的外套，拿起、放下都无所谓。而更像一个跌倒的人，渴望着——一根拐杖。

一直以来，都不仅仅是他的故事。

在那个“高尚的人该死”的年代里，他没有放弃高尚，而像一棵休眠的橡树子，不失自我、活下来。在他的叙述里，我在寻找他的逻辑，寻找自己的答案。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等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是不是还可以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的确，我总有一种感觉，包括他的语言、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毛时代”以前。自嘲“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民主、科学是那一辈精英的底色。我发现，何老一生没有被“赤化”，或者说“改造”，始终跟声势浩大的新思想格格不入，全在这层抹也抹不掉的底。

“作为学术来说，马克思有他非常深刻、非常正确的东西，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字字是真理’‘字字是谬论’的恐怕也极少，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哪能真理都让你一个人包了？”质疑本身就是科学的态度，凡一家之言就不必全“信”，更不用去“仰”。他的那层底色让他更相信逻辑、信普世价值，属于普遍的原则都钻石一样恒久远。而对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事，就像流动的沙，始终他都是警惕的。所以，革命的高调很难打动他，时代的洪水卷不走他。即便不得不振臂高呼“万岁”，不得不举起拳头表达忠诚，他的内心始终在嘲笑。

可以说，正是那层“资产阶级思想”的底色保全了他，没有当官发财的念想

也救了他。没有“野”可以隐，那就隐于市，与时代保持距离，最终保全的是“自我”。

“我”之所以为“我”，在精神自由，在独立的头脑。但新时代是不大喜欢头脑的，恩威并施，把众生一层层收买为信徒。交出你们的良心，交出你们的忠诚，最好你们都是大傻子，能对“亩产万斤”这样的话深信不疑。因为最终会有一颗头脑来替所有人思考，你们只需要执行，然后叫好、鼓大掌。但他不愿意，又无可奈何。于是，就活在自己清清浅浅的水湾里，安静极了。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这是帕斯卡尔的话，何老特别欣赏，乃至于把自己也活成了苇草。不争、不求，被吹歪了也不折腰，修成一根有思想的苇草。待泥沙尽落，至少属于“我”的那一泓水就清了。

记得在2007年，中文系请何老讲了一次，题目叫“谈诗与真——历史和历史学”，就在图书馆报告厅，是清华“哲学与人生”的系列讲座之一。快结束的时候，有位大一女生举手，说：“请问何教授，历史学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台下一阵嘘声，有人合上了笔记本。的确，这种空泛的话题太老套、太幼稚了，而且没有边际，让人怎么答？没承想，何老不假片刻的思索，拿起话筒就说：“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人生本来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

哈，多精彩！呱呱呱呱……（掌声）

所以说，千万不要被任何乌托邦的幻想唬住。甭管什么宗教、主义，不论它多么壮阔、多么的美轮美奂，只要一世俗化就完蛋。包括自由主义，这是我师兄补充的，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当我读亨廷顿的书，意识到“普世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又一次陷入了恐慌。如今，左派、右派都迷失了，整个人类陷入了信仰危机。但，人生依旧值得追求，人生必须值得追求。让你坚若磐石的，不在任何高邈、虚幻的人类理想，而是那个需大写的“我”——自我。

那，才是你最终的救赎。

三

《上班记》早就写好了，何老嘱我先别发表，说：“版权都是你的，等我死

了你再发，将来惹了麻烦也是你的。”这话他说过好几次，像句玩笑，彼此却都当真的。

加之前书曾被这样、那样的人议论，《上班记》更不敢怠慢，随口的话也得查一查。比如说到林彪，“人已经叛国死了十八天，还叫人民跟着他干革命。”又比如困难期间，全国人大不再公布国家预算数字、决算数字。我是效率极差的人，为这些话，在计算机上一查就是几个小时，俩眼都快瞪成二郎神了。

又比如，蒙文通被打屁股致死。孤证不立，何况一代国学大师，竟如此下场？所有记载中，只寥寥几个隐约的字，说他被“白昼系缚于‘牛棚’之中”（蒙默语），“负伤归家，旋即病卒”（吴天墀语），而这两位先生早已去世多年。老编辑说删了吧，不能求证的句子，别给自己惹麻烦。但我觉得，不该有人这么白白死掉。电话给四川大学历史系，几经辗转，真就找到了见证人，蒙文通的弟子、耄耋之年的张勋燎教授。老先生耳音不大好，几近颤抖一遍遍高声嚷，生怕我听不见。不几日，又亲访蒙家后人，确认了种种细节，特意写成文字寄过来。我的老天爷，这事竟然还能核实，我是不是该佩服一下自己？

包括两篇附录，原本只为了注释，结果越写越长，最后都成了文章。跟北大唐晓峰教授聊起来，他正痛风，耐着性子听我得意了半天，叹口气，说：“这是最起码的呢，写文章就该这样。”

一句话我就泄气了。唉，都是份内之事，其实也没什么好吹嘘的。³¹

《上学记》之后，有朋友约我再做口述。那些选题都意义重大，但我已倾尽所能，吐血一样完成了我的作品、我的救赎，就足够了。你们若有同样的心情，恰好遇到了合适的人，一定也能成就好的作品。又有人劝我做策划，那就更使不得了。因为我觉得，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没有什么是只有你想到、而别人想不到的东西。但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告诉你，那就是：亲力亲为、别偷懒，把你自认为最闪光的东西，一求到底。这个世界从不缺少疯子、狂徒和自以为了得的聪明人。殊不知，唯独珍贵的是傻子，你要去做其中的极品。

四

感谢前《记忆》主编乌扎拉先生耐烦我，又开放了私家书库任我乱翻。感谢

³¹ 为不妨碍阅读，本书注释已缩减。又，出于对本书风格的考虑，后记和两篇附录将另行发表。

叶师母留饭，私酿的果酒棒极了。感谢丁东、小群夫妇鼓励，愿你们的房子不被强拆。

感谢万圣书园刘苏里先生。感谢上海季风书园严搏非，虽隔了几重山水，先生从不敷衍，每问必查个水落石出，由是感激。感谢人民日报社刘学先生。感谢台湾《民生报》林英喆先生，失联很久了，愿你的牙齿都在，一切如常。

感谢北京三联的前辈董秀玉、吴彬女士，以及我同年生的酒肉朋友刘蓉林小姐。你们是我“娘家”的大枕头，伤心时可以抱一抱，谢谢你们待我一如当初。

感谢四川大学张勋燎教授。感谢《徐铸成日记》整理人徐时霖，先生博闻广识，每聊必到手机没电，由是感激。感谢北大唐晓峰教授，虽然对我的打击更多一些，不过打掉的都是虚骄。感谢清华唐少杰、师兄唐文明教授。兄从不以为我无知，且不像别的哲学家那样罗嗦，总能一语破的，由是感激。感谢同窗梅赐琪教授，或者副教授？无妨，反正早晚会是。感谢工物系蒲以康教授，作为原子弹专家，先生热衷于民间史料搜集，多有指点。还有未及留下姓名的学界中人，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感谢本书责编哼女士，我之较劲我知道，您之查漏补缺令我两眼放光芒。感谢林道群先生，让我觉得背后不再空荡荡，而是立着又一堵坚实而勇敢的墙。

何老于我有再造之恩，我之于他，不过是个忘年小友、频频登门的客。做口述那两年，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见。后来他换了股骨头、做心脏手术，他的姐姐过世、爱人过世，他的朋友一个个都不在了。而我也要生孩子，先是六斤半的大姑娘，几年后又“非法”超生了二姑娘。生活就像催人老的快镜头，与何先生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渐渐的，他出不了门了。

渐渐的，他下不了床了。

渐渐的，他的声音变得古怪。

最后两次，他竟认不得我了。敲敲头，用力想了老半天，还是那股子认真劲儿，指着我问：“你是谁？”

人活一百岁是种什么感觉呢？曾经他说，“与我同辈的人大部分都不在了，包括我的亲友，我的同事、同学，以及比较熟的人，几乎都去世了，只剩我一个……”于是，他越来越轻了，要以一种塌缩的方式，穿过宇宙的虫洞，抛开一切去找旧

相识。而我真后悔呢，没在他尚且记得我的时候抱一抱，临了还从他的记忆里清零了。

每一想到此，我就要掉眼泪，满脸都是大海的味道。☞

【序跋】

细节中的历史真相

——《寒空中的小星星》序言

胡发云

中国的官史大多不甚可靠，倒是许多野史，常常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许多治史或读史的人，常常喜欢读点野史，以相印证，也常常无意间发现了足以颠覆官史的真相。所以，官府历来都是极其痛恨野史并竭力将其剿灭之。无奈野史生于野，深山老林之间，小街陋巷之隙，很难一扫而光。许多野史的撰写人既不求闻达也不羨功名，所以这类文字历朝历代生生不息，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还有很大一部分文字——如散文、杂记、序跋、信函、日记、悼文、碑铭……虽然只是随意写下一些世道人心风俗民情，但常常也会留下很有意味的历史印记。

于向真的这本集子，内容涵盖了中共大陆建政之后半个多世纪中的社会万象人生百态，基本上都是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及引发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写的各色人等，大多是亲属友人街坊邻里同学同事前辈师友或一代新人。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读来平和亲近。她用那种拉家常的方式，叙述着往昔岁月，其中有许多令人信服的小细节，于是就出现了我前面所说的管窥效应——那些小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大历史。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录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数十年之后，能够重新浮现脑海涌上笔端的，想必总是有它道理的。

于向真的父母都是早年参加中共经历战火的知识分子革命者，49之后，长期在驻外新闻战线工作。1966年，她刚上初一，正值豆蔻年华，6月，学校骤然停课，这个单纯，善良，家教甚严的小姑娘，兀然间就卷入了这场疯狂的运动。

作为根正苗红的她，第一批加入了学校的红卫兵：

红卫兵由海淀区传到西城、东城两区后，迅疾扩散到崇文区，8月6日我校也组建起红卫兵，通告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我校红卫兵规定，父母是老红军或抗战胜利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才有资格，我被获准第一批加入，左臂带了一枚窄窄的红袖章……8.18后，我们仗着毛撑腰，猖狂不可一世，红八月中我也曾热病缠身自以为姓赵，记得一次外出执行“紧急任务”，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们高扬起右手拦车，故意左臂叉腰，将那条窄窄的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显露出来，当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很少，迫于毛如日中天的权威，汽车一见到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无不被迫赶紧停车，红卫兵说去哪里司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路线，哪怕调头也得先送“革命小将”。是的，八月中下旬“红小将”们仗着红司令，嚣张如匪！

没有外敌入侵，没有政权更迭，即无兵器也无武艺的一群丫头片子毛小伙子，仅凭胳膊上的那一道红箍，就可以喝停大街上正常行驶的车辆并命令司机开往指定的方向。这样的情形，即便是在十月革命或纳粹时期也不会常见。在紧接着的《迫害老师》一文中，她写到了关于一桶浆糊的故事：

大操场上乌泱泱站满了人，被划为“走资派”的女校长、校党委书记，有“反动言论”的教导主任，被学生反剪着臂膀押上半米多高的主席台，有人用高音喇叭带领喊口号，“XXX不认罪就踏上千万只脚，让她永不翻身，打到XXX！”震耳欲聋。我站在离主席台不远处跟着喊口号，旁观校领导被羞辱受折磨，耳膜都被震疼了。有人用剪刀当众将女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头发一缕缕剪掉，故意剪成凸凹不平的怪样子羞辱落难者。突然，有人拎着贴大字报用剩下的半桶糨糊，炎炎夏日，桶里剩下的糨糊已经腐败酸臭，那人风风火火大步流星上了台，一路扬播着酸腐不堪的臭气。接下来的情景让我忍不住“啊——”叫出声，急忙捂紧嘴巴，只见那人上台直奔女校长，抬起手臂将臭糨糊倾倒在大约和他妈妈差不多年纪的女校长头上，连噎带呛心力交瘁，女校长一下子瘫倒昏晕过去。

1966年8月30日傍晚，她在崇文区公安局听到的那一声“给点水喝”的垂死呼唤：8月30日那天傍晚，12个红卫兵拎着刚印好的一摞摞传单出了校门，走进学校对面的崇文区公安局，小飞让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他们分头去找车。彼时暮色初降，我站在区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小路上守着一摞摞传单，

突然听到有人用嘶哑之声朝我喊话：“给点水喝，给点水喝……”循声望去，我见到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那个满头满脸血污的重伤者，在他身后卧着一片死于和平年代红色风暴的冤魂，偌大一个篮球场，近五分之四的地方被横七竖八叠放着的死尸覆盖了，刺鼻腥气与微微腐臭随风飘来，催人欲呕。吓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狂跳，魂飞魄散之时，海云回来了，她也看见那惨人的惨景。2006年8月6日，49中老同学聚会时，我俩还回忆起那血腥一幕，尽管事情过去40年，我俩还是忍不住打起寒战。

这样无声的场景，让所有“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艰辛探索”之说成为荒谬。那些躺在公安局篮球场上死去的或即将死去的人们，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志与能力，他们早已对胜利者表示了臣服与崇拜，其中很多人正在努力悔罪争取早日加入到这个革命的队伍中去。对他们这类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虐待与屠戮，也是在世界进入现代以来少见的。在革命大串联的列车上，这个一直受到书香门第文明熏陶的女孩，开始跟着高年级男生学习骂人：上了火车我们特别兴奋毫无睡意，坐在硬座上谈笑风生。初二的刘胜利（合影中后排右一）嘲笑我不会骂人“革命斗志不旺盛”，我就跟这位当年的大帅哥学起骂人，他一字一顿教我：“你他妈的少他妈的找他妈的茬（挑刺），小他妈的心他妈的剋（揍）他妈的你。”开始我说不顺溜，周围人笑得前仰后合。骂人，是文革期间的时髦，两次串联途中我学会骂人，一张口就妈呀妈的，直到年底回到家被姥姥好一通修理才扳过来、净了嘴。几年后进工厂有段时间旧病复发，嘴里又不干不净，交男友后才彻底根除。

本原很容易产生温馨感的车厢里，也上演着阶级斗争的活剧：……次日上午醒来，迷迷瞪瞪听到敲盆敲碗声伴着“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反革命，我有罪……”的喊声，原来列车上其他中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连夜逐个车厢查访并虐待打骂遭遣返的“地主婆”和“反革命家属”，强迫那几个老年妇女顶着破报纸糊的纸帽子，在窄窄的过道里敲盆敲碗喊着自己该死、有罪，一节节车厢地被押解着游走。我们守着将去散发的传单，没参与火车上的迫害，也没制止“黑五类”车厢游。

当时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同一时期我最亲爱的姥姥，也被郑州造反派强行注销户口遣返回原籍，途中姥姥经一好心乘客告知“那边车厢有人被学生在脑门刻上‘地主婆’，血顺着额头往下流，眼睛都被血糊住了。”生性刚强的姥姥闻言，

赶紧悄悄溜到厕所里将身体钻出半截小窗，当车转弯速度慢下来时姥姥一松手让自己跳下去，脚脖子扭坏了，爬着回到老家……

她那不愿受辱刚烈跳车，拖着一条伤腿爬回老家的姥姥，这位从年轻时代忠心耿耿追随共产党，跟随早年参加革命的丈夫出生入死的老人，就因为她出身于河南一个大户人家，为革命奉献数十年后，变成了革命的敌人。

书中多处写到自杀，一次就在作者居住的楼栋：

我住的新华社宿舍皇亭子大院，文革中至少有十多人自杀，有一次我小妹妹正在楼下跳皮筋，从楼上跳下的新华社名记者杜叔叔脑瓜崩裂、鲜血迸溅，惨死在我小妹妹面前，吓得她接连几夜在睡梦中惊叫不已。

还有一位同小区的邻居，她丈夫是农业展览馆的馆长，1966年被打倒：

……白天强迫“牛鬼蛇神”干脏活累活百般羞辱，晚上换班接着批斗毒打，终于在一天深夜，不堪屈辱的馆长乘人不备逃出牛棚，一头扎进农展馆后面的湖水里。第二天被拖出水面时，馆长的脸被锋利的冰碴儿和水塘里的尖木桩刺破已面目皆非，扭曲的肢体惨不忍睹，馆长夫人被叫来，见状即刻昏死过去。苏醒后，她将满腔愤恨倾泻到住在她家阳台对面那座楼一层的某人，那人也在农展馆工作，据说以前曾受到馆长信任与重用，文革初期开始造反，挺能折腾。神志半昏的馆长遗孀把怒火集中指向他，天天站在阳台上冲他家方向大骂“老奸巨猾大坏蛋！两面三刀大坏蛋！杀人不见血的大坏蛋……我要杀了你呀大坏蛋！”没多久，那家伙慌忙搬了家，据说他舍近求远，新家离单位很远很远，他从此退出派性斗争，变得沉默寡言。仇人已搬家的消息，馆长的儿女一遍又一遍告诉妈妈，但她完全不理睬，依然每天站到阳台上，冲着固定的方位，亮开嗓门高声叫骂。

大串联中，作者从广州返回北京，途径武汉：

又遭遇到一起卧轨自杀的事（之前去上海，我们坐的火车刚驶离北京站不远就在丰台附近紧急刹车，我把头探出车窗见司机下车勾出一名卧轨者摆在铁轨旁，车迅疾驶离，没想到武汉又遇到一起）。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就在眼前，我们索性下了车，走到大桥上看滔滔长江似磷光万点。在桥头堡，一位工人模样的男人阻止我们靠近大桥围栏，并解释说“每天都有人寻死往下跳”，伸头朝下一看才知道，从这里跳下去不是江涛而是水泥路面，必死无疑。

读到这里，作为一个老武汉人，作者文中提到的地点立刻出现在眼前——那

就是万里长江第一桥的蛇山桥头堡，近三十层楼高，下面是一片开阔的水泥地面，是文革中自杀最多的地点，从那里往下一跃，没有一个活得下来。桥下那片临江的广场，多年来都是附近居民夏夜最好的纳凉地，我儿时常和邻居小伙伴们各自夹了一卷凉席到那儿睡觉。1966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我们睡到半夜，突然听到附近传来汽车爆胎一样的轰响，接着听到有人喊：跳下来了，有人跳下来了！我们跑过去，看见一个不太完整也不成人形的决绝寻死者……

以革命的名义，摧毁一切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文革的一大发明。文革高潮时期，她的父母也遭受了批斗，并搬出自己的居所，数年后当她家再搬回来的时候，她写到了那些金鱼缸——

文革时，养宠物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爸妈遭难时我家被迫搬迁到皇亭子大院东南角一老旧楼房狭小的顶层，几年后“落实政策”搬回皇亭子21号楼时，一进门我们都惊呆了，屋里满满全是没收来的大大小小的金鱼缸和几个鸟笼子，金鱼缸竟达上百个，我和妹妹费了好大劲才清理出去。这样的场景类似于奥斯威辛焚尸房堆积如小山的眼镜、皮箱、高跟鞋……这每一个蒙满灰尘的金鱼缸，都来自一个遭难的家庭。我在《迷冬》第一部结尾时曾写到“独立寒秋宣传队”从大西北返回途中在西安解散，有人返家，有人赴京，有人南下进川，我就是那一次和几位队友入川去了成都，住在川大体育馆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从房间的窗户望下去，一整个室内篮球场堆满了各种高档家具、钢琴、乐器和艺术品及古董字画，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看着看着，突然生出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物品无言，但老天有眼。

作者还写到1966年她在上海亲历的一件事：

一天清晨我们列队途经淮海路某弄堂口时，有位中年妇女站在路旁先是看着我们，随后跟着走在最后一个的我身边，小声问“依是伯京来的红威军？”我使劲点点头，她一把拉住我，把手里攥着的一大串东西塞进我手里，说了句“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说完扭头就跑了。我赶上队伍低头看，手里是长长一串黄白两色双股金属链子，中间镶嵌着十几颗色彩各异的宝石，在旭日的柔光下闪烁着妙不可言的璀璨。“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其中必有沉甸甸的含义，我警觉地提醒自己：不能装进裤兜！我就用手使劲攥着，停止行进后赶紧汇报情况并交给领队荆小飞。

直到2007年，有一次我们那帮老同学在花市大街钱柜聚会，唱KTV间歇时聊起大串联的事，我向两位同去上海的男生追问主教的项链，那宝贝的下落让我大跌眼镜，敢情我们12人离开上海和广州后，逗留武汉期间，几个男生一拍即合，跑到汉正街一家古董铺用项链变现，买了12张武汉到上海的船票，“余下的钱我们几个吃了顿好饭”。

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渐渐消停，从中共九大之后，权利重建，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一批文革中产生的政治骨干进入各级政权，一批被打到的干部再度出山，一批文革中接管地方政权的军人，则成为新政的核心骨干力量。一度收敛的权利腐败再度抬头，作者当时已经进入一家企业，她在后来的很多篇章中，写了她当年经历的往事，在那些真切的描述中，我们又看到很多有价值的故事：

1975年我被调到工厂劳动工资科当劳资员，那之后十年，是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鼎盛时期，已有4000多、近5000名职工。我厂每月厚厚一册工资表最后几页，是无科室车间编制、只领工资不见人影的工资名单，这好几十人从来不上班，每月按这份表到工厂财务科出纳员那里直接领钱，或者由熟人代替领取。记得1983年我曾为此气不忿找科长提出异议，科长很为难，最后的结局是我不再负责工资管理……我对面办公桌的老张负责人员调配，他让我看过一些资料表，从上面我清楚地获知文革期间在我厂参加军管的几位军人，陆续将好几十名亲友安排进我厂，其中安插人最多的就是军管组组长门双成，他介绍来的人全被安排在最优岗位。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些熟悉的套路？

还有一些故事，是作者父母亲那种特殊职业才能知晓的：

1975年春节，河内分社忽然来了十几位不速之客，一听他们中有人会说标准的普通话，分社雇员就热情地把他们让进会客室，我妈妈闻讯从二楼下来，刚请他们落座，就见一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馆员急匆匆跑来招呼我妈妈出去讲话。他告诉我妈妈，这些人原来是南海的中国岛民，后来这个岛被中共领导人“赠送”给越南了，“这些人已经是越南人了，尽快让他们离开，以免惹出外交事端。”妈妈让使馆的人走了，进屋环视一周，一下就被那些人眼睛里流露出的感情打动了，马上亲自为这些人沏上好茶，并殷勤地拿出从国内买的高级糖果，剥开糖纸一一递到他们手中，转一圈回过头时，妈妈惊讶地发现他们不论男女每个人都激动得

热泪盈眶，有几位年长者更是双泪长流，哽咽不已。妈妈又劝他们喝茶，耐心地等他们慢慢平息激动之情。

“好久没喝过这么好的茶了，真香啊！”“好久没吃过祖国的糖果了，真好吃啊！”他们开口说。然后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妈妈，自己原来是白龙尾岛的中国岛民，以打鱼为生，岛屿被赠送后成为越南公民，抗议无效，不久岛上的人都被输送到越南大陆，分别安置在不同省份地区。“现在生活大不如前了，非常艰苦……”，我妈妈劝他们：“仗快打完了，以后该搞生产建设了，日子会好起来的。”“哎——”，他们叹着气说：“日子苦点倒没什么，我们很多亲戚都在中国呢，再也见不到了！”“把我们分散的哪儿都是，过年了好不容易聚起这些人，每逢佳节倍思亲呀，今天可好了，我们总算见到祖国的亲人啦，还吃上祖国的糖果、喝上祖国的茶了。”说到这儿，老人的眼泪止不住又淌了下来。

她也写了在那不可理喻的年代，驻外的机构如何进行文革运动；一个好友一心要嫁干部子弟而受骗，最后发现已经怀孕而自杀；写到从家里小保姆那里听到她的家乡是如何以偷盗倒卖自行车为生；写到饿死数以千万计的三年大饥荒——一直被掩盖的这一段痛史，在作者笔下成为亲历者的叙述，饿死人近些年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但是在1961年，稍微松绑后的秋收，竟然还撑死过人：

那几年可是把我饿怕了，刘魁庄死人少一些，可也没少死人呢，谁也不敢打听死过多少人，连说都不敢说，谁提起这些事就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马上要挨批斗的。其实都知道死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姥爷还有多个亲戚都是59、60年饿死的。那两年，从来没听说村里有人生孩子，连二连三听到的都是谁又“病”死了，没人敢说是饿死的。开始死了人用炕上的草席一卷，很快席子就用光了，后面死人只能就那样光着，扔沟里或扒个坑一埋就算了。

60年太苦了，幸好我们村挨着那条河，能捞点杂草充饥，就那还是饿死一些人，我也差点被饿死，人饿狠了那滋味忘不了，到现在想想都吓死人啊。怎么也没料到，第二年1961年秋天收成了，我哥哥和好多人却被撑死了。那年秋季收下粮，公社食堂终于开始做数量大的饭，人们吃了还想吃，哪知道肠胃不中了，饿的时候太长了，肠胃变得精薄，猛一吃多，人就不中了，那一下撑死不少人呢，我们村撑死的竟比前一年饿死的还多！

再说回60年，那时候孩子饿得嗷嗷哭，我姥姥下地干活时偷偷往腰里别了

两小块红薯，收工时一紧张顺裤腿掉出一块，被发现了，薅到场院挨批斗，人被抬回家就不中了，很快咽气了。那时经常批斗人，我村旁边不远的刘庄村，有个壮汉陈文德说了句“西北出了扫帚星，怕是要翻天了。”为这一句话，他挨批斗挨了半个月。那时上头有精神，发动各村批斗坏人，“坏人”站当间（中间的意思），上去一群人，你一拳我一脚，倒下去马上被薅起来接着再打。

所有这些，都是细节！细节！细节！没有耸人听闻的渲染，没有宏大的理论阐述，这些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的还配有当年的照片，这些细节，像小小的针尖，足以让自我宣喻的伟大崇高壮丽辉煌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如果说，历史的真相在细节中，那么人性的善恶就在文字的情怀里。可以说，是勇敢与真诚护卫了作者的良知。作为中国红色革命的女儿，作为二十世纪那场最疯狂最暴虐的运动参与者，她完全可以像她那些当年的红卫兵战友一样，依然恪守着他们的理想、信念与一套自己也不相信了的说辞，继续为这样的事业这样的制度做最后的辩护士与守卫者，也依然像当年那样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个制度给予的各种特权……令人欣慰的是，于向真选择了做一个人——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忏悔、自省与悲悯之心的普通人。

因此，我向读者推荐这部真诚好读的小书。📖

【述往】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15）

——1976年，悼念周总理

李红云

1976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

1976年以发表毛泽东在1965年写的两首词开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写道：

这两篇光辉的作品……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³²

社论中，用“到处莺歌燕舞”对当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人民意气风发、国家欣欣向荣进行了大力渲染。而大家心里都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大家心中最牵挂的，还是周总理的健康。

终于，噩耗还是传来了。

1月8日，周总理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这一噩耗的公布是在第二天早上。

1月9日早上6:30，校园里的大喇叭准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刚开始传来的是阵阵哀乐声。宿舍里刚起床的同学们都紧张起来。接着就是“……沉痛宣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宿舍里的同学们默默流着眼泪听完了讣告。有的同学没有去食堂吃早饭。

上午上课时，悲伤和压抑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教室。老师的眼睛也是红红的，声音哽咽着艰难地上完了课。

有一首诗是这样描述当时大家的心情的：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³³

接下来的几天里，悲伤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哀乐飘浮在空气中。我们班统一制作了黑纱，大家默默地戴在手臂上。同学们还买来白纸，含着眼泪做成白花戴在胸前。戴着黑纱和白花，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加入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中。

³² 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载于《红旗》杂志1976年第1期，第5页。

³³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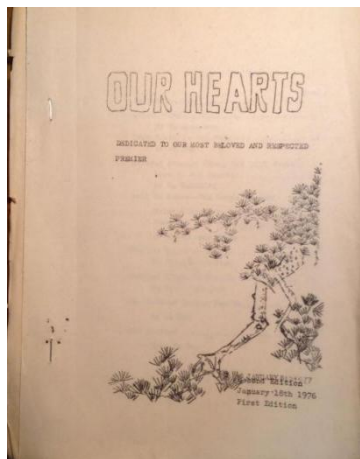
1月11日下午，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出来送往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侧，在十里长街默哀送别。那天，我站在西单路口，经历了“灵车队，万众心相随”的场面。那一刻，沉重的瞬间仿佛凝固了，又仿佛是一次重大的洗礼。那种巨大悲伤中蕴含着的巨大力量是那天我深切感受到的。

在周总理的骨灰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期间，每班分配到一个名额代表大家前往吊唁。

1月12日下午，全年级同学在教学楼的404教室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大会。记得会场黑板上的大会标语是我和另一个同学用白色粉笔书写的。会上，有参加了遗体告别的同学讲述了自己的感受。

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追悼会后，我和几个同学从学校出来，想到天安门广场再经历周总理的骨灰从大会堂出来移到八宝山的场面。谁知，那天人太多，交通拥堵。我们从二外出来乘公交车一路向西，到了王府井车就不能走了。我们绕道步行至南池子，就被拦住了。后来听到的就是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土地上”的消息。

葬礼和追悼会以后，邓颖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接见了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治疗组医护人员。她着重指出，医护人员已经为了治疗、看护病重的周总理而不遗余力，以及周总理坚毅地跟病魔做过的顽强斗争。³⁴我从家人那里得到了邓颖超的这篇讲话，工工整整地抄在了笔记本上。



追悼会后，为了表达怀念周总理的心情，以我们年级为主的几位同学自发编写了一组悼念周总理的英文文章，自己打印并装订成册，定名为“*Our Hearts Dedicated to our Most Beloved and Respected Premier*”（《我们的心，献给敬爱的周总理》）。³⁵

其中的文章如下：

Adieu, Premier Chou, by Tu Shen-hua (涂胜华：“永别了，周总理”)

³⁴ 周尔懿著：《我的七爸周恩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第242页。

³⁵ 详细过程参见涂胜华文：“1976年和1977年二外英文版周总理纪念册”。该文称，1976年1月只装订了不超过15册。1977年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又制作了第二版。本文引自第二版。

Ever Green Is the Mountain, By Wu Lan (吴澜: “高山常青”)

Beloved Premier Chou, You will Forever Live in Our Hearts, By Hu Hsiao-ti
(胡小笛: “敬爱的周总理, 您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st in Peace——Our Respected and Beloved Premier ——We Shall always
Remember You! By Chen Liang-chong (陈良忠: “安息吧, 我们尊敬的敬爱的周
总理——我们将永远怀念您!”)

For All Springs to Come, By Chang Hsiu-feng (张秀丰: “为所有到来的春天”)

Eternal Glory to Premier Chou, By Chian Hai-yen (钱海燕: “周总理永垂不朽”)

The Saddest Moment for Me, By Lu Hua (陆华: “最悲痛的时刻”)

Two Diaries, By Su Yen (苏燕: “日记二则”)

文章作者中只有胡小笛是北京外国语学院 73 级的, 其余均为二外英语系的
同学。苏燕、钱海燕和张秀丰为 74 级, 其余均为 73 级。

在当时的没有电脑, 没有打印机的条件下, 把这些文章打字、印刷、装订并
非易事, 所有的工作需手工完成。先把文章写在纸上, 然后用手动打字机把文字
打在蜡纸上。打字要求手法均匀, 否则印出来的字有深有浅, 而且打字不能出错,
错了很难修改。蜡纸打印好后要用手动油印机蘸上油墨印在纸上。除了技术上的
要求外, 印刷用的纸张都要自己到处找。但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技术上的。因当时
“四人帮”仍在台上, 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受到了压制, 所有的自发悼念活动都不
能大张旗鼓地进行。

几位同学克服了重重困难, 终于印出了几本。据涂胜华同学估计, 装订成册
的不超过 15 册。1977 年, 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 他们将一年前的纪念册重新
印刷, 我保存的正是 1977 年 1 月的版本。与 1976 年版本不同的是, 77 年版本
多了篇“前言”³⁶, 其中写到:

一年前,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人民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江
河山川同悲, 整个世界都为他默哀。但是, 魔鬼“四人帮”看到这个人的去世,
认为扫除了他们做梦都想扫除的障碍, 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一时间, 白色恐怖

³⁶ 该前言原文为英文, 中文为笔者翻译。

笼罩，乌云布满了天空。在他们重压政策下，人民被禁止佩戴白花和黑纱，不许向这位伟人献上花圈。但是，人民不是牛马，永远不是！

我们——年轻的学生，八亿人民中的一滴水，各自自发地拿起了我们的笔，写下了这些悼念文章，其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这位伟人最高的崇敬和最深的热爱，同时怀着对这些魔鬼的无比仇恨。

这些文字表达了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怀念周总理的感情是真挚的。

对周总理的感情

二外与周恩来总理有着特殊的渊源。

1964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建立二外，并亲自选定二外校址，亲自确定校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7月下旬，周总理曾五次来到二外看大字报，听辩论会，向全院师生发表重要讲话。³⁷对此，《周恩来年谱》有着明确的记载：“（1966年）7月24日、25日、26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1966年）7月28日、29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见学生辩论会。”³⁸

对周总理来二外的事，我们在73年入学后就有所耳闻。

我们入学的1973年，正是中国外交工作刚刚开创了新局面的一年。随着1972年美国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中日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周总理所说的“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³⁹这些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周总理在这些重大外交活动中作出的杰出贡献，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高大而完美。同时，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让已

³⁷ 见许鸿雁：“历史回顾 校庆感怀”，载《二外四十年》编辑委员会编：《二外四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72页。另据周总理的侄子周尔懿的描述：“七爸由国外回来，果然就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亲自观看大字报，与群众谈心，了解运动情况。他和大家打成一片，虽然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显然不同往年，但仍然置身于群众之中。”见周尔懿著：《我的七爸周恩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第194-195页。

³⁸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42、43页。

³⁹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475、477页。

经成年的我们渐渐打消了要“解放全人类”的念头，要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⁴⁰的雄心壮志也逐渐褪去。

在我们入学前的1972年，周恩来对教育进行了整顿，这才有了我们1973年入学时的“文化考查”。入学时，我们是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二外的。本以为我们可以抓住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好好学习英语，将来有希望为国家的外交工作作出贡献。但随着政治风云的不断变幻，入学后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我们期盼的学习环境始终没有到来。尤其是入学后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很快成了“批周公”，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总理。这使得我们对这种运动或多或少产生了逆反心理，不再积极投入，对政治学习等活动也是敷衍了事。

因为是学习英语，所以对周总理的外事活动格外注意。虽然周总理1972年就被检查出身患癌症，但病情并未公开，他边治疗边强撑病体照常工作。在1974年三月中旬到五月底的两个半月内，周总理除日常工作外，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⁴¹那时，信息来源主要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周总理的消息。直到1974年6月1日他住进医院。

习惯于每天听到周总理的消息，突然几天音信全无。这种反常的情况让人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记得我周六回到家里，跟父母谈起此事，他们也已经注意到并找人去做了了解。很快，消息传来，周总理病了。大家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在学校和要好的同学中，我们也会经常谈论周总理，听说他生病了，大家都忧心忡忡。一直到1974年9月30日晚，周总理抱病出现在国庆招待会现场。当他步入大厅时，立即全场沸腾，掌声雷动，中外来宾争相上前致意。⁴²听到这则消息大家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了一些。但看到总理憔悴的面容，又不禁担起心来。

接着，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提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我国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他宣布：

⁴⁰ 这种提法可见1968年左右开始流传于当年的红卫兵中的一首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当时我把这首诗一字一句地抄了下来。

⁴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670-671页。

⁴² 王海光：“‘批林批孔’运动”，载于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338页。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⁴³

我们是通过安装在教室里的小喇叭收听的周总理的报告。他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想到祖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要在我们手中实现，心中充满了力量和自豪感。当时的兴奋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们年级有个同学连夜写了篇文章，表达了这种激动的心情和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奋斗的决心。

在周总理病重之后的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上旬，邓小平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同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会上，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邓小平上任伊始，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展开了著名的1975年全面整顿。⁴⁴在整顿中，“左”倾文化思想开始遭到部分的质疑、批评和纠正，文化工作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

几年的文革已经把民众折腾得精疲力竭，对“四人帮”一伙的行为早就看不惯了。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手段十分有限的情况下⁴⁵，民众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在私底下传递着各种“小道消息”，发泄着对“四人帮”的不满。我和几个关系较好的同学中也经常有这样的信息传递，聚在一起时也会谈论这些“小道消息”。其中就有关于电影《创业》和《海霞》的争论。⁴⁶

⁴³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479页。《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刊载于《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

⁴⁴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353页。

⁴⁵ 文革期间，中央牢固地掌握着新闻和传播媒介，通过这些媒介传达对运动的领导精神或者指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解放军报》（简称“两报一刊”）是当时最重要最权威的报刊。“两报一刊”社论或者评论员文章是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和精神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也是传达中央指示的重要渠道。详见印红标：“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信息传播”，载《华夏文摘》，第1092期，2021年2月23日出版。

⁴⁶ 关于电影《海霞》的争论，可参见霞飞：“‘文革’期间围绕电影《海霞》的一场斗争”，载于《党史文苑》，2005年第2期，第37-40页。

1975年7月，一批文艺作品开禁，重新上映故事片《创业》，接着是《海霞》。以电影《创业》和《海霞》的上映为标志和先导，中国荒芜多年的文艺园地又重新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那时，我们的课余生活很单调，除了看过不知多少遍的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和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没有电影、文艺演出。忽然有了新电影，大家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那时在二外看电影都是在露天。全年级在教室楼前以班为单位排好队，每人搬着自己的椅子，列队来到露天的电影放映场。我记得看过的电影有创业（1974年）、平原游击队（1974年）、杜鹃山（京剧）（1974年）、南征北战（1974年）、侦察兵（1974年）、渡江侦察记（1974年）、闪闪的红星（1974年）、海霞（1975年）、决裂（1975年）、春苗（1975年），等等。在放映电影的正片之前，都要放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那时电视不普及，也没有《新闻联播》。所以，《新闻简报》是了解当时国内外大事的一个重要途径。

虽然当时“四人帮”极为猖獗，“左倾”思潮严重，但大学毕竟是大学，各种知识的接触，信息的交流，独立的思考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想法。“批林批孔”非但没能影响周恩来的形象，反而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一个忍辱负重、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总理的光辉形象。当时在同学中，对“四人帮”的反感，对政治运动的厌恶已经相当强烈。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是我们觉醒的开始。

总的来讲，我们受的教育仍然是“要忧国忧民”，周总理成了我们心中的希望。

经历“四五”运动

1976年春天，整个中国处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作法，特别是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感憎恶，强烈不满，迫切要求纠正严重的“左”倾错误。⁴⁷这种情绪终于酿成了1976年清明前后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

⁴⁷ 金春明：“四五运动述评”，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四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471-1472页。

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⁴⁸

1976年的临近清明节时，已有许多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不同于周总理刚去世的那几天，此时人们的情绪已是愤怒盖过了悲伤。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献上花圈、诗词，用这种方式悼念周总理，并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那首著名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就是这种情绪的真实写照。

从二外到天安门交通很方便，出学校南门坐公交车到郎家园换乘1路公交车即可。同学们纷纷在课余时间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我所在的一班同学们还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花圈，几个同学抬着花圈上公交车，司乘人员非但没有阻止，还和乘客一起帮忙把花圈抬到了车上。同学们到广场后，把花圈摆放在纪念碑附近，还把胸前佩戴的白花摘下来系在纪念碑南面松墙的链子上。

一连几天，我和好友马燕波都是在中午饭后就溜出学校赶往天安门广场，晚饭时才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去天安门还不能大张旗鼓地去，校方的态度是不禁止不鼓励。记得有一天，广场上聚集的人非常多，我和燕波挤进人群，拿出笔记本抄下诗词。燕波嗓音洪亮，站在人群中为大家高声朗读。她慷慨激昂的朗读引得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在广场上度过了整个下午。眼看天色已晚，我们俩急匆匆挤上1路公交车赶回学校。公交车十分拥挤，上车后我一摸衣兜，顿时大惊，我放在衣兜里的笔记本竟然不翼而飞了。当时我穿的是一件有四个口袋的旧军装，笔记本就放在下面的一个口袋里。笔记本的大小跟普通钱包的大小差不多，可能是被人盯上了。我一路心情沮丧地回到学校，想想抄了一下午的诗词全没了，眼泪就掉下来了。燕波担心的不是诗词没了，而是担心我们可能被便衣盯上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迹其中。⁴⁹

当晚，人回到学校，心还在天安门广场。

对二外师生参与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汪文风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

⁴⁸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28页。

⁴⁹ 鲁利玲：“我亲历的‘四五’运动”，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第30页。

在发生了震惊中国、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之中与之后，二外院广大师生员工响应“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号召，大规模地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斗争。虽然受到了追查和压制，但运动的精神却在二外院掌握了群众，埋在人们心里对“四人帮”仇恨的种子要发芽，要开花，要结出丰硕的果子。⁵⁰

4月4日星期天是清明节，那天我和家人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哥哥是摄影爱好者，拿着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历史学家王年一先生这样描述那天的情况：4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花圈摆满了广场。这一天到广场的人数达200万人次，秩序井然。⁵¹

当时我不知道的是：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并作出了收缴花圈，禁止群众悼念活动的决定。当夜出动了民兵和公安人员，洗劫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花圈、诗词和条幅、标语。⁵²这次政治局的会议，已经给群众悼念的活动定了性。⁵³

第二天，4月5日星期一，同学们已经听说了昨晚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有同学记得那天工宣队要求不要离开学校，校园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们年级仍有同学不顾禁令去了广场。有同学回忆，傍晚前，校门已关闭，他们是翻墙出去的。

傍晚，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场的讲话，称“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晚9时半广场的灯都亮了，9时35分，对纪念碑前未散的群众进行清场。⁵⁴凑巧的是去广场上的几位同学在清场前离开了广场，因为再晚就赶不上回来的公交车了。这也使得他们躲过了最后的抓捕。

⁵⁰ 汪文风：“‘童怀周’走过的路”，载《二外四十年》编辑委员会编：《二外四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96页。

⁵¹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431页。

⁵² 详见金春明：“四五运动述评”，载于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484页。

⁵³ 王年一先生的书中有这样的描述：“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详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440页。

⁵⁴ 详见李海文：“天安门事件的前前后后”（二），载《华夏文摘》增刊第1258期，2021年2月2日出版，原文另载于《江淮文史》，2016年，第5期。

当晚，警察和民兵手持木棍、皮带包围了广场，对被包围的群众进行了毒打、拘捕和审查。⁵⁵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叫嚷着对制造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党中央的，要严加追查，坚决打击。⁵⁶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消息。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⁵⁷我们被要求集体收听了广播。当时在心中充满了愤怒、不解和失望，想想未来，不禁忧心忡忡。从此，除非在要好的同学中，不再公开议论此事。

从4月8日起，一连三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群众、解放军部队游行拥护中央的决议。我们也被要求参加了游行，记得是学校的卡车把我们送到了天安门广场附近。当时，天安门广场仍然戒严，队伍无精打采地走过天安门，象征性地抬抬手，嘴里几乎不发出声音。

很快，大清查开始了。⁵⁸一位在天安门广场上念过诗词的女孩被当作“要犯”关进了监狱，审讯人员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⁵⁹警方发了通缉令，通缉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所谓带头的人，其中就有一个被称为“小平头”的年轻人。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⁶⁰“小平头”的真实姓名是刘迪，他是我嫂子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去嫂子家玩的时候还见过他。

事发三个多月后，刘迪被抓，关进了位于半步桥的监狱。⁶¹刘迪的事情很快我就从嫂子那里知道了，她叮嘱我，千万别跟别人说你认识刘迪。她这样说并非

⁵⁵ 详见金春明：“四五运动述评”，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486页。

⁵⁶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434页。

⁵⁷ 童怀周主编：《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96页。

⁵⁸ 《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写道：“据内参消息，从4月3日到4月27日，北京市抓现行犯、重大嫌疑犯分子已有200多人。27日北京召开2万人大会，批斗6名天安门事件中的‘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统计6月17日在北京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000多件；从中选出600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的共1984件，共拘捕群众388人。至于在单位以隔离、办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更大，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见严家其、栾文华、刘长林、李惠国、高世瑜、杨柄编写：《四五运动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169-170页。

⁵⁹ 鲁利玲：“我亲历的‘四五’运动”，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第30-31页。

⁶⁰ 徐晓：“‘小平头’刘迪，大相隐于世。”文章来源于网络，

<https://mp.weixin.qq.com/s/cZnv1IXGbPGm6217NrC3eg>，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7日。

⁶¹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3月23日，刘迪才出狱。出狱后，他才知道因为他的案件使许多人受到连累，包括他的家人和朋友。参见刘迪：“我这个‘小平头’”，载于《丙辰清明纪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年1月，第157-159页。

多此一举，当时各个单位的清查已经开始，二外也不例外。清查的内容包括：所谓的“谣言”，那些天谁去了天安门，谁抄了诗词的，抄了的要交出来。对这种清查，多数同学保持了沉默，私底下也表示了反感。有一次班上开会，要求大家说出听到的“谣言”。教室里一片沉默，没有人说话。过了好久，才有一个同学说，“我听说潘冬子（指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角色）死了，不知道这算不算谣言。”

在4月5日天安门的群众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后，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分别召开大会，表彰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斗争中立了功的先进集体和个人。⁶²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被安排到许多单位作报告，讲述当天他们的“英雄”事迹。到二外作报告的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一位女民兵。听到报告人熟悉的名字之后，我往台上看了一眼，确认她正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听着她在台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的发言，我坐在台下，心中充满了愤怒与鄙夷。

关于“童怀周”和《天安门诗抄》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1976年4月8日在二外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4月8日凌晨，在二外的北食堂（教工食堂）就发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小字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江张姚三家村！……”后面还写着一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院工、军宣队和革委会立即展开追查。

……查核3月下旬至4月上旬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干了些什么，看到些什么；以及社会上、学院内存在的大量抨击“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是如何传播的，追根究底。并连夜搞排队摸底，笔迹鉴定，要搜查出小字报的作者。我所写的大量文章的原稿都被他们搜去；退回来时，发现许多字的横、竖、撇、捺以及各种偏旁部首，都被铅笔划出……⁶³

⁶²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435页。

⁶³ 汪文风：“‘童怀周’走过的路”，载《二外四十年》编辑委员会编：《二外四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92页。

小字报因为是贴在教工食堂的，这件事当时我并不清楚。问了一些同学，有人有点模糊的印象。还好，当时在二外汉语教研室任教的汪文风老师⁶⁴留下的文章中对此事情有着详细的描述。⁶⁵

说到汪文风老师的这篇文章，就必须提到一个名字——“童怀周”。其含义很明显，就是“共同怀念周总理”。她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集体，由当时二外汉语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组成，汉语教研室当时有20多个老师，其中署名参加“童怀周”的有16名老师。⁶⁶汪文风老师当时是汉语教研室的主任。

这些老师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收集了清明前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贴出的成千上万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并从中选出了一部分，稍加注释，汇编成册。在当时印刷条件极差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刻板，油印成册。署名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

1977年1月8日，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童怀周”将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到了天安门广场。一时间，《天安门诗抄》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童怀周”之名响遍全国。此时，正是我们73级即将毕业的时候。有关这本书的信息也在同学中流传。但我并没有见过这本书的油印本。

目前我手头保存的版本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编：《革命诗抄》（第一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材科印刷厂印刷，1977年2月（工本费0.50元）。该书并非正式出版物，是由二外印刷厂自己印刷的。

⁶⁴ 汪文风（1929年8月-2015年12月30日），曾用名汪易修、江流，重庆人。中共党员。1946年毕业于重庆社会大学新闻系。1949年前当过纤夫、徒工、小学教员、报纸编辑，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和专职委员、研究室副主任及主任、二办副主任。1949年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编辑、校对科科长，北京《光明日报》记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中央纪委派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6年参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并参与编辑、印刷《天安门革命诗抄》，是“童怀周”小组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纪委委员，任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简称“两案”）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1992年离休。2004年出版《从“童怀周”到审江青》。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汪文风/8740562?fr=aladdin>，访问时间2022年1月11日。

⁶⁵ 详见汪文风：“‘童怀周’走过的路”，载《二外四十年》编辑委员会编：《二外四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90-196页。

⁶⁶ 同上，第196页。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编：《革命诗抄》（第二集），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北京印刷一厂印刷，1977年7月（工本费0.65元）。该书也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却是由正规的印刷厂印刷的。

这两本诗抄问世时，我已毕业离开了二外。听说二外编了这两本书后，通过留校的同学买了这两本书。

另外的版本还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编：《天安门革命诗文选》，1977年11月，工本费1.20元。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编：《天安门革命诗文选》（续编），北京新华印刷厂1978年4月第一次印刷，工本费0.70元。

我保存的版本也是同学帮助买的。

正式出版的版本是：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二外编辑的有关天安门诗抄中，只有这本是正式出版物，该书的书名由华国锋主席题写，可见这本书的影响有多大。该书出版的时间已经是1978年年底。

1978年12月24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公报宣布了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⁶⁷至此，这场以悼念周总理引发的群众运动，终于以人民的胜利划上了句号。我们也在离开二外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这里，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往往后来被人误解，认为他们是和“四人帮”站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就我的经历和了解的情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对政治的关心是工农兵学员那一代人中一些人不可避免的情结。因为那是一个政治与个人的生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时代。⁶⁸

但在1976年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在清明节的“四五”运动来临之时，作为整体的工农兵学员，尽管受到了压力，但他们的心灵无疑是与天安门前的抗议

⁶⁷ 童怀周主编：《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61页。

⁶⁸ 李江源：《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泛政治化教育中的受教育者》（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570页。

人群相通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在二外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中收录的这样一首诗：“工农兵学员的话”中写道：“工农兵大学生……偷做洁白花一朵，送到丰碑前。”⁶⁹

《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中还有一篇署名“十个工农兵学员”的长诗——“请收下”⁷⁰。里面有这样几句：“任刮起十级台风，掀起万丈黄沙，谁也不能折断我们不屈的脊骨，谁也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将用青春的热血，烧红满天的朝霞。”

这正是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广大工农兵学员从心底发出的声音。

对于我们这代人，“四五运动”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并非组织安排、而是群众自发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第一次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认识到文革的危害，表达对当时当政的“四人帮”的不满。这也为后来的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上的基础。

历史有权这样说：其后一些更伟大的事件，只是这一开端必然的延续和发展。

71 

【述往】

一位省人大代表的自述

——根治西淝水患（上）

张树田

“光杆子”代表

2003年初，中央和省、市、县、四级人大换届，按当时年龄界线不能继续提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由当时县委书记高晓牛兼任主任。可能市、县领导们认为我还能办些事吧，2002年底仍推荐我作为下一届市、县和省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送到省里去汇报时，我的名字被剔除了，原因是2003年满60周岁退休年龄。我获悉后打电话给具体办理此事的省人大办公厅处长韦大伟询问，并告诉他：我是1943年10月出生，按规定市人大常委会委

⁶⁹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第285页。

⁷⁰ 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编：《天安门革命诗文选》，1977年11月，第174-178页。

⁷¹ 见刘白羽：“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载于《丙辰清明纪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年1月，第1页。

员退休年龄是 63 周岁，我还有近四年的工作时间，是否不可以推荐为候选人了？他又问我有什么技术职称？我告诉他是高级工程师。他说，我来向领导汇报。第三天，韦大伟电话告诉我，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类型推荐为候选人，并且已经告诉刘昭。于是在淮南市人大十届一次会议上第三次当选了省人大代表。自我感觉，利禄之心比较淡薄。自参加工作以来在工作岗位安排上都是服从调遣、顺其自然，没有为自己的升迁动心思做过“工作”，之所以一直还比较顺利，主因是我所处的环境风气还比较好，唯有这次发生了一点曲折，内心是希望继续利用这个平台办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我想，我有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1. 60 岁，身体还可以。2. 子女不在身边，没有太多生活琐事。3. 在淮南地区特别是凤台县工作生活三十多年，县区的党委、政府、人大工作二十多年，对这一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社情、民意比较了解。4. 无官一身轻，“光杆子”代表，更超然于官场关系之外。

选定目标

当选后我反复琢磨：我要为社会做些什么事。1. 必须是实事，要能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2. 让老百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见到效益。3. 必须在省人大、省政府职责权力之内有条件办，要使主办单位没理由上推、下卸、拖延。4. 受益覆盖面要大些，以利形成比较大的推进合力。想来想去，我在这一带工作生活三十多年，给这方百姓带来祸害最深重的就是水患。最苦、最累、最使人提心吊胆的事就是防汛。程度虽不同，基本年年都有，两三年就有一次比较严重的。在凤台，淮河虽然最重要，但它是归中央管的，要求确保死保，提防构筑标准高，维护得好，绝少有险情。在凤台，2 / 3 以上的防汛救灾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在西淝河流域。西淝河灾害频繁，老百姓饱受其苦。西淝河下段流域跨多个市、县、区，要治理非省政府出面莫能。

西淝河综合治理涉及三个市四个区县，其业务跨发改委、水利、交通、国土资源（矿产）四个部门，投资要几十亿元。这么大的项目，估计最终决定权在中央，这么大一件事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做议案提出，必须很慎重，提得有凭、有据、合情、合理，让人家当成一回事。这就必须：查阅资料、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征求市县主管部门意见、征求参加提出议案人大代表的意见。在市人代会当选省人大代表，到省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开幕，只有十来天时间，中间还过春节。

这个年度，从中央到基层五级人大换届选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政府、法院、检察院都要换届，各级领导都高度集中注意力忙着这件大事。在省人代会前做好这些环节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搞调研还难免为谁拉票的嫌疑。所以第一次会议没能提出。

做准备

2004年元月份举行了省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我提前一个多月做了准备。县水利局派了工程股长李茂泉帮助整理资料。然后草拟了题为《根治西淝水患，开辟黄金水道，繁荣煤电基地，造福百万人民》的议案。该初稿包括 1. 概况；2. 存在的主要问题；3. 灾害情况；4. 对保障矿区安全繁荣煤电基地重要意义；5. 治理的建议要点。（全文参见附录）初稿形成后，打印分送县委、政府、人大有关领导人和发改委、水利局、交通局征求意见。带着修订后的初稿，先后分别由有关同志陪同出去调研、征求意见、联络其他县区的省人大代表。先后有县人大副主任张万信，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高福平，人大常委会委员高家华、苏文彪，县水利3局副局长徐莉、工程股长马长富等陪伴。先后到了利辛县、颍上县、阜阳市颍东区，与他们人大的有关领导、水利局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与驻在该地的省人大代表商讨，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次调研中把四个县区 2003年这次洪涝灾害的灾情作了统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2.47 亿元，这个数据很有价值。利辛县水利局提出，要求增加在凤台与利辛交界处建闸、在西淝河与茨淮新河交汇处建排灌站的意见，在修订中予以吸纳。同时协商确定了三个市的代表联系人：淮南市高福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阜阳市王寅（颍上县水利局副局长、河道局局长），亳州市金国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利辛县人大副主任后转任副县长）。会议期间高福平一直被安排和我住一个房间，与我出行同车，吃饭同桌，工作上帮助我。在利辛县水利局的同志陪同下，我们察看了五十年代修建的阚疃闸。他们介绍，建闸时这里还归凤台县领导呢。我们又到贾桥乡后刘营察看了西淝河被茨淮新河拦腰截断的情景。总之，这次调研基本做了初步摸清情况、取得共识、建立起工作网络，为推进工作打下了基础。

西淝河概况

西淝河是淮河的重要支流之一，它发源于河南省太康县马厂集，流经安徽亳州市谯城区（原亳县）、太和县、阜阳市颍东区（原阜阳县）、利辛县、颍上县、凤台县六县区，至凤台县峡山口入淮河。全长 250 公里，流域面积 4750 平方公里，属平原区。1976 年茨淮新河开通，于利辛县贾桥乡后刘营东将西淝河截断，将上段汇水截入茨淮新河至怀远县城西南入淮河，下段汇水仍循原河道入淮河。西淝河下段本干长 72.4 公里，比降为 1 / 40000，有港河、济河、苏沟三条支流，流域面积 1621 平方公里。流域涉及阜阳市颍东区、利辛县、颍上县、凤台县等分属三个市四个县区的 28 个乡镇，4916 个自然村，人口 125.7 万，耕地 178.59 万亩。流域内当时已有建成和在建的大型、特大型煤矿 13 座，如张集矿、张集北矿、新集一、二、三矿，4 谢桥矿、顾桥矿、顾桥北矿、顾桂矿、杨村矿、丁集矿、板集矿、口孜集矿等，设计生产能力约为 7000 万吨。西淝河在凤台县境内本干长 42.4 公里，流域面积 530 平方公里，涉及 10 个乡镇，人口 28 万，耕地 50 万亩，涉及煤矿 9 座，产能约 3500 万吨。

主要问题

1. 入淮口有闸无站，形成“水口袋、关门淹、望水旱”，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西淝河入淮河处凤台县峡山口先后建了并联的新老两座节制闸。其功用是，在淮河水位抬升至高于西淝河水位时，关闸抵御洪水内灌，退水时开闸泄洪。但淮河高水位时节，往往也是本地降雨最集中的时节，全流域的汇水滞蓄于此，造成水位节节攀升，造成大面积长势正旺的农作物被淹，千家万户的农民房倒屋塌，流离失所。2003 年特大洪涝灾害，西淝河流域直接经济损失达 12.47 亿元。倘遇大旱，无泵站从淮河取水灌溉，只能“望水旱”。2001 年大旱，西淝河断流，西淝河下段流域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 亿元。当时我多次到抗旱前线巡察工作，在断流的河道中，乡村安排用柴油机驱动水泵抽些泥浆用来栽红薯。我到钱庙乡，看到不少处农民正在用锅锥打井取水栽红薯，乡长童涛在现场讲，一棵红薯用一碗水就行了。沿西淝河两岸大片的水稻苗已经干枯，一片白茫茫了，淮河虽然有水但没有设施提取啊，只能“望水旱”。

2. 盲目无序地围滩造田，挤占蓄水面积，降低了蓄滞洪水的能力。西淝河

下段本干有生产围堤 38 处，其中利辛县 8 处，凤台县 30 处。对堤顶高程缺乏严格管理。

3. 河道淤积严重。由于历史上黄泛影响，又缺乏疏通整治，泥沙严重淤积，港河口以上河床淤深达 1--2 米，严重影响蓄滞洪水、蓄保水源和通航能力。非汛期已基本不能通航。

4. 干堤堤身薄弱，标准偏低。沿河排灌泵站大都建于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设备普遍老化。

5. 入淮节制闸碍航，阻断了与淮河航道贯通。

提出要点

初稿中对如何治理提出了 11 项要点，但最关键最根本的是“三大件”：一、建排灌大站，解决“关门淹”和“望水旱”；二、建船闸，实现西淝河与淮河、茨淮新河航运连通；三、疏浚河道，加大洪水的蓄滞能力和航船的通过能力。四、整顿河滩生产圩堤，退保结合，缓解人与水争地的矛盾。五、对沿河泵站进行必要的更新改造。

第一次提出，列为“重点”

议案成稿后分送县里有关领导人，市、县发改委、水利局、交通局、国土资源局等，通气和征求意见。我带了四十多份到合肥参加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到后，即分送淮南市、阜阳市、亳州市三个代表团，交代表们酝酿。我交给淮南市委书记陈世礼、市长朱季历、人大副主任丁志聪、省人大副主任陈维席等，请他们提意见并加以关照。特别陈维席，他是刚卸任的淮南市委书记，又是主席团常务主席，希望他努力争取列为议案或重要建议。我是领衔人，和高福平分别找淮南代表团代表们签名附议。又一起到阜阳市、亳州市代表团驻地找联系人王寅、金国珍联系征求附议代表签名。三个市的代表共有 57 人签名。会后得知，此案已列为大会 24 项重要建议之一，主办单位是省水利厅。按规定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主任、副主任、秘书长）领衔跟踪督办。我很欣慰。

《答复》言不及义

4月初，收到了水利厅3月31日签发的皖水办〔2004〕28号《对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第245号建议的答复》，其中强调对西淝河的治理是作为沿淮洼地治理规划中的内容，基本措施是退垦还湖、产业结构调整、实施高水高排云云。绝口不提建大站，解决“关门淹、望水旱”这个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我当时思谋，西淝河流域是沿淮洼地中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板块系统，完全可以首先规划治理，这样答复就是推脱敷衍。

六、七月底，又收到交通厅7月22日签发的议字〔2004〕28号文件《关于对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第245号建议的答复》，该文对情况的陈述与分析，对实现复航已做的前期工作和总体规划、拟做的工作及投资匡算及融资的设想都作了说明。文件最后承诺：“若水利部门近期投资治理西淝河河道，我们可以结合西淝河的治理，提前实施西淝河复航工程。同时，为保证投资效益，煤矿企业也应参与投资建设。”至于后来煤炭市场发生严重下行，还要“去产能”，河道治理未如当初设想得那么快，这是没有预料的。但交通厅这个答复是真诚、务实、积极的。

为了加大力度，又约请金国珍、王寅来凤台和高福平我们四人联名写了致省发改委主任朱先发、水利厅长吴存荣的信，并把我们的议案寄给他们，目的是强化刺激，促进他们重视。他们都很郑重地回复予以肯定表示感谢并认真研究办理云云。当然我们是姑妄知之。我们写信的目的是打个信号：我们睁大眼睛盯着这件事呢！

CWX 首次督办无果

2014年5月份我到北京探亲，6月初接到单位电话，称省人大副主任 CWX 将率队考察西淝河治理问题，要求我参加。于是我立即乘火车回到凤台。6月9日 CWX 带领省发改委、水利厅、交通厅、国土资源厅、及省人大机关一帮官员来到凤台，市里对应的官员有市人大副主任丁志聪、张学田、秘书长韩丽荣，副市长李忠，以及市发改委、水利局、交通局、国土资源局主要官员。县委书记牛向阳在中央党校学习。县长姚多咏、副书记赵春阳、副县长 CXX 及对应部门的领导人参加座谈。

在座谈会开始前，我把议案文稿复印发给与会人员，并作了简短发言，县政府领导人汇报就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了，是表态性的。但 CXX 的汇报令我始料不及，他在汇报中说：“关于建大站问题，如果由省里管的话，可以建。”在座的其他党政官员听之任之，没有谁出面补充纠正。

我当时很诧异又很生气。心想：西淝河祸患就是“关门淹”和“望水旱”，根本原因就是内涝没有大站强排，干旱没有大站抽水灌溉。不建大站何谈根本治理！你说的是“如果由省里管的话”才“可以建”，7 似乎 CWX 和省里几个部门的领导来乞求你们“恩准”建站呀！他这样说也有客观原因：姚多咏、赵春阳刚从市里调来，他们都没搞过水利工作，对这方面的情况所知甚少，我写的议案虽然由工作人员送到他们办公室但不知道看到了没有，甚至未必看得懂，所以只能原则性地表态而已。而 CXX 原本是县水利局一般干部，对西淝河流域这么“宏观”的事项不可能关心和思谋。质言之，即便是县水利局或是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也未必关心和了解全流域的情况，更不可能思谋怎么治理。他是被县长临时拉来汇报的。县水利局副局长徐莉参加会议，她没有说话。省水利厅派一位处长参会，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

我要说的话已经在议案中有了比较充分的表达，座谈会开场时又把该讲的套话也说了。县长姚多咏又做了原则性的表态，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我想，这么重大而且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轻易就能办成，今天只是开个头。

下午 CWX 一行到刘集西淝闸一带考察一番，又沿淝左堤一路向北赴利辛和阜阳了。

向县长公关

县长作为我第一个“公关”对象绝对没有料到。因为向 CWX 的汇报不可能是副县长 CXX 自作主张的，按常规应该是他授意。第二天下午我到县长姚多咏的办公室向他解释，凤台县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把西淝河治理好，“关门淹”是几十年的老问题、大问题了，所以经过反复酝酿才提了这个议案。至于大站建成后由谁管理的问题现在不要提，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大站建起来，解决了“关门淹”的问题再说吧。他似乎也认同。在交谈中他谈到水利局领导干部如何积极能干等等。我想，我在凤台这么多年了，对干部的观察了解比你多。我意识到他

对情况不是茫无所知，很可能是已有“歪嘴和尚”给他念了“歪经”。看来，主要是担心大站真的建起来，管理的责任落在自己头上呀。这是我根本没有料到的。我不由地感叹：哦！身为县政府主要领导人，考虑这样的大事还这么狭隘、片面、自私，掂不出轻重。难矣哉！

准备再提

虽第一次提了议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也有积极意义：1. 在三个市的党委、人大、政府的主要领导和省人大代表中广泛地知道有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人关注。2. 淮南市水利局于 2005 年 1 月 14 日向市政府写了《关于请求省政府综合部门牵头协调对西淝河下段进行综合治理的建议》（原文见附录）。我在 2005 年 1 月在省人代会上见到这个报告。这是市水利局对我们议案的积极呼应。毫无疑问，这个报告的发源于我们的议案。3. 舆论初步形成：一是 CWX 率队视察西淝河流域治理的消息被省市县媒体报道；二是省电视台在 2004 年底的《代表风采》栏目对我做了专题采访，我在刘集乡西淝河岸边做现场接受采访中说了，下一次人代会还要继续提关于西淝河治理的议案。这个专访在（安徽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三是在 2005 年 1 月的省两会期间，在省电视台的两会特别报道中播出了我与其他代表手持地图研究撰写关于治理西淝河的议案的画面。特别是专访有一分多钟，过后不少熟人都说看到这个专访了。这些宣传对我个人无足轻重，重要的是这件大事初步得到公众知晓，尤其是让生活在此地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又被列为重点

2005 年的省“两会”报到时，我带去了打印的《关于制定总体规划，开展西淝河综合治理和根本治理的议案》，送到时任淮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淮南市代表团团长陈世礼的房间，请他审阅。并提出建议请他考虑牵头由淮南、阜阳、亳州三个代表团联名提出。他欣然同意，并答应与阜阳市胡连松、亳州市邵国荷联系。于是我和高福平带上打印的《议案》分别送给金国珍和王寅，请他们发给本团的代表酝酿提出意见并征求代表签名附议。过后，金国珍告诉我，邵书记很重视，组织亳州代表团全体代表讨论了这个议案。

这次，有陈世礼、胡连松、邵国荷代表三个代表团签名提出，并有94名代表联名附议，力度明显加大了。这次明确强调要“制订总体规划”，要“综合治理”和“根本治理”。并强调了修建船闸开通航运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同时我借在代表团会议上与CWX邻座的机会，请他关照争取把这个议案继续列为“重要建议”。

我们第二次提出的议案又被大会列为“重要建议”之一，确定由省水利厅主办，按规定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领衔督办。开始从省人大获悉，这次由副主任张春生领衔督办，我很高兴。因为张春生在省人大分工宣传工作，我应他要求写过几篇稿件，打交道多一些，见解也比较契合。由他领衔督办，我相信这件事会出现转机。于是我立即给他写了信，介绍有关情况，提出督办的建议。但很快又知悉，仍然由CWX领衔督办。

我于4月初到北京儿子那探亲，接到县人大办公室的电话告诉我，CWX要率队来凤台考察西淝河，我就连忙赶回凤台了。CWX来凤台考察带来了水利厅陈中才副厅长和规划计划处处长WXX以及省海事局党组曹书记等官员。市委副书记潘祖华，市人大副主任丁志聪、杜传新、秘书长韩丽荣等。市水利局、发改委、交通局、海事局等部门的官员都按要求到会了座谈会开始时CWX说，县长姚多咏有其他事请假，等会儿来。我看到县人大有两位副主任到会了，水利局还是副局长徐莉到会，其他的认不清。

CWX让我先说一说。我想西淝河的情况和我们对治理方案的建议在《议案》里都写得很清楚了，不必重复，只补充说明了这是西淝河流域老百姓的迫切要求，这次的《议案》有三个代表团代表讨论一致同意联合提出，并有94位代表签名附议，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期盼，等等。

接着，市水利局局长陶继帮发言。他高度评价我们的《议案》，并说他们市水利局领导班子“集体学习”了这个议案等，我当即摇头表示不赞成用“集体学习”的说法，我实在不敢当啊！他在潘集区当过公社的水利员，担任过区水利局和乡镇领导干部及潘集区委副书记，对沿淮的洪涝灾害有亲身经历和深切体会。省水利厅陈中才副厅长发言应该是很有分量的。但是，他发言除了穿衣戴帽的客气话只是说西淝河治理是作为沿淮洼地治理的内容，至于怎样治理、何时启动这些具体内容都没说。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研究过10这个问题，只是把沿淮洼地

治理这个“大筐”亮一亮敷衍我们而已。他还称西淝河的内涝可以考虑引到永幸河枢纽排出云云。把 1610 平方公里的涝水舍近求远绕个大弯子引到永幸河枢纽这个小站去排，这太荒唐了，永幸河枢纽的装机容量再加两倍也不够呀！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处长王 XX 的发言的中心内容就是建大站“效益不理想”。当时我意识到，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发言其实就是把我们关于建大站这个最关键、最核心的意见给否定了，就差没有直接说“不能建”了。但他们发言没说出任何依据，这等于把我们当成小孩儿忽悠着玩了。我当时又气又恼，幸好年过“耳顺”，已可以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了，何况以后还得指望他们办事呢，还是以“忍”为高吧。可不能“小不忍乱大谋”。

座谈会上，我向海事局曹书记询问了通航的问题，他称对通航已做了规划，如果水利部门疏浚了河道，交通部门可以建船闸，船闸的规格是千吨级，这项目要交通部批。而且他把印制很精致的规划本子拿给我看了。我又问这个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能否引入市场机制，采用“贷款建闸，收费还贷”的办法，他说，还没有先例，这要交通部批。在座谈会结束前，市委副书记潘祖华讲了几句要“以人为本”之类的原则话，看来他既不分工这方面工作又不懂业务、不了解情况，来参会和讲话纯是礼节性的。

CWX 总结性的讲话大意是，关于西淝河治理要在对沿淮洼地统一治理中统筹解决，是他讲话的主题。很明显他是跟水利厅唱的一个调子。座谈会后，来人到了现场考察，我也陪同去了禹王站。在机房里听了介绍后，参加陪同的县人大某官员又冒了一句：“要建大站得由省里管！”我听清楚了。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样说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想。这次督办，我收获了一肚子气！

冷静面对

我们满怀热情，满怀希望，倾心竭力奔走呼号，确实也赢得了不少干部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期待。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工程太大，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起多大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例是金国珍告诉我的：在亳州市的省人大代表中有一位是某县水利局副局长，金国珍找他签名时表 11 示：“这么大的项目哪能搞成？”随同我到利辛考察的徐莉在出发时随口说：“我们催催弄弄就是了。”还有，我到颍上县见到主持县人大日常工作的崔副主任，据闻他曾担任过县水利局长和主管

农业的副县长，向他征求对《议案》的意见，他看了稿子只是轻飘飘地说：“行啊，呼吁呼吁就是了。”表明了行业内的人，对做成这件事未报什么信心，当然也更不谈决心了。

还有，更明显的是，主办单位省水利厅的官员在敷衍抵触，不想办真事。身为省人大副主任、担当领衔督办责任的 CWX 则成了水利厅官员的尾巴，不起任何促进的作用。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县长却表现漠不关心。你有多要紧的事，在 CWX 来督办凤台县这样的大事时刻你却请假不能参加？对办理这样一件为一百多万人民解忧患、谋福利的大事，竟然遭到如此冷漠、抵制、敷衍，我根本没料到。

我感觉到办这事还真有不小的难度。但我也想清了：1. 这件事必须办。不办，一百多万人民永远不能摆脱水患的祸害。我们有机会为此尽力，感到幸运。如果错失良机无所作为，将会悔恨终生，愧对作为衣食父母的一百多万老百姓。2. 我们提出的建议要点，已经征求了所涉及四个县区的有关领导和水利部门的意见，又征求了七十年代凤台县水利局长和常务副县长齐儒卿，淮南市原水利局长及副市长、水利工程师王润泽，九十年代市水利局长陈国坤等一些老行家的意见，他们均表示赞同和支持。3. 省人代会上有 94 名代表签名附议，在会场上利辛县委书记王德贵特意找到我，表示《议案》符合利辛的实际情况。这都表明了我们的主张是得人心顺民意切合实际的。4. 眼下只有省水利厅和凤台县有些领导干部表现了抵触、消极和冷漠，这表现了这些人对人民疾苦的漠视和思想观念狭隘僵化。

对于持抵制和冷漠态度的人，我不由得气愤难平。我想：老百姓在水深风雨中抢险抗洪，淋一身雨水，踩两腿泥巴，你们都没见识过吗？老百姓“跑水反”的时候在大堤上全家老幼挤在一个庵棚里，门口堆放着破旧家具、放一辆手扶拖拉机和冒着黑烟的煤炉子，晴天日晒风吹，雨天宿无干处，晚上蚊叮虫咬。重灾区的农民长期忍受贫穷的煎熬，这些你们不知道、不动心吗？大站建起来管理有多难？难道比老百姓“跑水反”、度灾年还难吗？这些人宁可让老百姓长期遭受灾害和贫穷的折磨也不愿自己多担一点责任、添一点麻烦！真正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而且，西淝河流域面积 1620 平方公里，凤台县只有 530 平方公里，占比不足 1/3，建起大站服务全流域三个市的三县一区，省里怎么一定会放心给你凤台县管理？说不准，到时你想管而不可得呢。

对此，我想只有耐心再耐心，多做正面宣传，创造条件伺机突破吧。

算出大账，揭穿谎言

对水利厅规划计划处王 X X 处长关于建大站“效益不理想”的说辞，只感觉是唬人的，但又拿不出具体数据来。怎么对活，怎么服人呢？

我想，必须具体算算账，用具体数据讲话。首先请王润泽同志帮了忙，他是水利工程师，当过市水利局长、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对水利工程从理论到实践经验都有很深的造诣，对这件事很关心也很热心。经过他类比测算，西淝河大站的装机容量大约在 1.5 万千瓦。与最后由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正式确定的 1.44 万千瓦非常吻合。以这个数据为基础，又请县水利局副局长黄仲友等同志测算，大站、船闸、河道疏浚这“三大件”共需投资约为 11 亿元。而 2003 年的一次洪涝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是 12.47 亿元，也就是说治理后一次大的洪涝灾害可避免的直接经济损失要大于“三大件”的建设投资总额。至于治理后，必将加快这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人民群众得以摆脱旱涝灾害和贫穷，免去防汛抗洪抢险耗费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干部群众的辛苦劳累，加快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这是第一笔账。

第二笔账是，开通航运的效益：西淝河流域的煤的产能约为 7000 万吨，若有 20%可走水路外运，每吨大概可以节省运费 10 元，每年可节省 1.4 亿元。那么，8 年所节省的运费即相当于“三大件”所需投资的总和。同时水运比汽车运输大幅度减少燃油消耗、减少废气和粉尘、噪声污染，减少事故损失。这诸多的效益并不都是金钱可以换来的！这些大账虽是粗线条的，但也是八九不离十。经过这样计算，我也更清楚、更踏实了，信心更足了。

抓关键少数

对西淝河综合治理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虽然在《议案》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但真正入心入脑的省市领导人毕竟还少，特别是关键人物。所以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宣传这件事。在省人代会淮南代表团会议上、市人代会的风台县代表团会议上、在淮南市组织的省人大代表视察交换意见的会议上，我的发言中必然要讲这个话题。特别是省领导人到场时更要讲。后来参会的市委书记陈

世礼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代表团会议上说，“如果暂时不能开工实施，也可以先做好前期工作，作储备项目。”有一次分管交通的副省长黄海嵩参加淮南代表团会议时我说了：“阜阳、亳州的代表说了，黄省长是你们淮南的代表，要把这件事办好了，再选省长我们都投他的票，让他高票当选。”说完大家都笑了。还有一次开会，省长王金山来淮南代表团，在去卫生间的楼道里碰到市长刘建，他又提出让我在会上再讲讲西淝河治理的问题，我照办。

在不同场合讲述此事主要突出：1. 西淝河流域两三年一次小灾，七八年一次大灾，老百姓饱受水患之苦，农民收入低于周边地区，生活长期不能得到改善。西淝河不治好，奔小康没指望。2. 西淝河流域在建和投产的大煤矿众多，特别需要根治水患保障煤矿的安全。3. 当前煤矿建设和生产形势大好，经济效益节节攀升。为国家财政收入贡献大幅度增加，可以拿出资金治水。4. 农民为煤矿建设以低廉的补偿贡献出自己的土地，有的还离弃家园，承受了污染之苦，应该分享发展的成果。5. 建成大站实现排灌自如，当然会发生管理和运行费用。但这个费用比起可免除的损失来，一个是以百万、千万计；另一个以亿和十亿计。管理可能有些难度，麻烦事多些，是可以克服的，能比农村的计划生育还难弄吗？

形势发生变化

对这种迷茫的形势，如果 2006 年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但不可能有什么效果，而且有可能遭到进一步的冷遇甚至被以某种说词予以封杀，因为还是这件事，面对的还是这帮人。

似乎是苍天有眼，在 2005 年上半年到 2006 年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与此事有关的几个变故：1. CWX 被撤职。他在担任淮南市委书记前，在宿县地区专员任上，领导搞了地直机关非法集资，被日本商人骗去 4000 多万元，致使机关干部长期上访追债。因此以失职错误被撤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他是以淮南市人大常委会罢免其省人大代表资格而使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消失这种程序去职的。2. 省水利厅副厅长陈中才升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离开了水利厅。3. 县委书记牛向阳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习回到凤台。4. 县水利局由宋孝良接替杨玉国担任局长。5. 西淝河流域的煤矿的产量和效益空前高涨。

最后一搏

我明白，2008年1月要举行新一届省人代会第一次会议，我的省人大代表的职务就结束了。西淝河综合治理这件大事虽经多方努力在舆论上、各方面认识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具体工作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还没破题呢。重大工程必须规划先行，把规划制订出来，才算把这项工程推上运行的轨道。但是我能为这件事效力的机会只有2007年的省人代会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流行语使我感觉到现实的特殊意义了。下一届凤台县有谁当代表，未知；对这个短期不可能见到效果的事有没有兴趣，未知；未来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未知。退一步说，纵然回答都是肯定的，至少情况是不熟的，人头也是生疏的。就是说2007年若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很可能前功尽弃而甚至茫无头绪了。有了这几个方面的变故，如果精心谋划，这最后一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于是谋划起草了《关于制定总体规划，对西淝河（下段）进行综合治理的议案》（全文参见附录）。这次的文稿，与前两次相比虽然主题还是同一个，但补充了新的情况、新的认识、新的要求。比如1. 由于水害频仍，流域内农村人口2002年人均纯收入仅为1200元，远低于皖北地区的平均水平。2. 淮河本干的大规模治理大大增加了调蓄能力和排泄能力。3. 江淮运河的开通已提上日程，将提高对西淝河的调蓄和补给能力，提升西淝河航运开通的意义。4. 当时西淝河流域煤电产业建设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效益之高为历史空前。无疑，有这方的百姓和地下资源的贡献。5. 沿淝三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处在历史上最好最快的时期。6. 对西淝河综合治理完全符合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皖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

《议案》还要求该案交由省发改委牵头主办，水利、交通（海事）、国土等部门共同办理，就是说不要再由水利厅牵头主办了；建议研究是否可以把船闸的建设和运营引入市场机制；《议案》还申明：“凤台县对前期工作的费用承诺可以承担部分或全部。”这句话我事先征求了县委书记牛向阳的意见，用以表达凤台县的迫切期待。

跟进做几件事

《议案》仍照老一套程序运作，还不错，淮南、阜阳、亳州三个代表团征得

77名代表签名附议。为了确保效果，还与之配合做了几件事：

1. 请高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综合治理西淝河的问题应慎重交办和督办的建议》，提出：1) 如果该议案转为建议，要求继续列为重要建议，由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领衔督办；2) 因涉及水利、交通、矿产资源等有关部门，建议由省发改委牵头与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办理；3) 研究督办方法，加大办理力度，力求取得实效。

2. 在会议期间我给黄岳忠同志写了信。当时由省委书记郭金龙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岳忠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我曾与他多次在工作上打交道，对他颇有好感。信的主要内容有：1) 这件事两次被省人大列为重要建议交水利厅主办至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表示不满意；2) 建议改由省发改委牵头主办；3) 如改为建议，要求继续列为重要建议，由省人大领导同志领衔督办。

3. 委托时任省人大机关工会主席的凤台老乡张景兰同志，拜访了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请求关照，并买了些小礼品奉送，表达谢意。❏

【书讯】

《北京大学文革资料续编》在美出版

编者按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5月25日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陆平：“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社论说：“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7个月之久。这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篇社论宣示了中央对北大社教运

动的新的评价，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遭到围攻、打击的“左派”们终于获得解放。但当年的北大学生，对北大1964—1965年间那场严重党内斗争却一无所知。

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的初衷，原是借彭真下台为自己在“社教”中的遭遇申诉，以免被打成“反党集团”。但在毛泽东的亲自导演下，这张大字报的作用，就远不是他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了。大字报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轰动效应和连锁反应，是聂元梓等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有幸收集到关于北大社教运动的一些资料。限于篇幅，本书主要选用了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期间“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会议简报”（部分）及相关人员的揭发材料等。

2020年5月，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编写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该书出版后，我们又收集整理了一些有关北大文革的资料。本书的内容是对已经出版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的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文革资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这些资料随意性很强，没有统一的标准。为保持文献资料的原貌，我们只对个别明显的错误进行了修正。☞

胡宗式 章铮



【资料】

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资料选登（1）

北大政治系党总支书记张侠

《我的意见》

1965年6月8日

长时间以来我感觉我们学校党委内部民主生活不够正常，思想斗争不够开展，缺乏应有的批评自我批评精神，许多问题个人说了算，我虽然不同意有人不负责任的夸张说，在党委会上可以把茶碗说成尿盆子。但的确有许多不按党的原则办事，以个人的好恶感情来代替党的政策，甚至歪七扭八非党的做法也不受到制止、批评。

下面，我就几年来接触到的几个重大问题，来说明这一点，也就是向党委有关同志，特别是陆平同志提点意见。

第一件，反江隆基同志问题：据我所知，江在学校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表现右倾，但多年来对学校建设还是有贡献的，特别是解放初期，对苏修的一套东西还没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那样相信我们党能领导教育，骨干比较少的情况下，改造一个旧的大学是不容易的，错误恐怕也是难免的。在他调走之前对他进行个全面鉴定，做些适当的批评，在某些问题上展开原则上的斗争是应该的，但在他走后，还把他多年来的文件，统统翻印发给全体党代表，并要我从全部大字报中编出有关党委领导意见，汇集成册，也准备发给全体党代表。纲目是陆平同志亲自核定的，我是按他意图组织孙觉、张凌青等同志共同编的，我再三提议加按语或说明，他不同意，我觉得大字报中意见片面性很大，坚持不同意发全体党代表，谢道渊同志也同意我的意见，后来没发成。这是不是有点全盘否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那时我是常委，我不了解上级有让这样反江隆基的指示。“陆平反江隆基有功”这一点我确实不很理解，为此曾问过崔雄昆同志，似乎他也说不具体。

第二件事，双反时，要我给马适安同志写大字报，而且要在上千人的大会上

念，我因意见已在小组会上提了，常委会上面对面也谈过，又没有值得那样大张旗鼓的意见，表示不想这样做，陆平同志批评我“畏首畏尾”，并以“常委带头”来督阵；我大会念的不那样慷慨激昂，又说我“士气不壮”。对这样烧同级干部，而且硬逼着下级去烧是斗争性强呢？还是有不纯的东西呢？但是你又没有体现出在运动中带头引火烧身的模范样板，只是一味烧别人。

要斗争张凌青同志时，我们感到没有抓到他政治上的错误，提了意见，陆平同志又在党委扩大会上点名说：“张侠你这面红旗可要扛得住呀！”那一阵子是你政策掌握的不稳呢？还是夹杂有想打一批人，露一手，使别人怕你的不纯动机呢？你在一次干部会上拍桌子瞪眼睛说：“管你什么三八式大革命都要整”，这不是有意吓人吗？现在能只泛泛的检查过头了，而不深挖思想深处的东西吗？要不，你既能那样勇敢的犯错误，而在平反时却又为什么那样的怕出头，甚至要各系总支承担学校掌握批错了责任呢？这合乎党的政策吗？合乎组织原则吗？

再说河南调查组案件的平反，市委邓拓同志在干部大会上代表市委做了很深刻的检讨，我们学校呢？陆平同志缺乏感情的念了念党委决议，没作个人检查。

第三件事：1959年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错误斗争阎遐同志，到1962年平反前后，党委少数同志在某些方面进行无原则的配合问题：那里斗争前，曾派他们政治部副主任林乔同志来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常委谁谈了什么，他们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讲：“不光阎遐有问题，他爱人也不干净，在三面红旗上有问题。”这合乎事实吗？常委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我呢？其次他们学院错误的捏造了阎遐六大罪状开除党籍、军籍的请示报告，一直没有得到领导机关批准，我们常委怎么会有了一份？错斗一个学院负责同志的材料报告，没有经过总政、市委和通讯兵部转，学校就能直接接受吗？而且1962年就平反了（陆平在阎遐同志在军事学院学习过程曾告诉我说：肖华副主任要他告我阎遐问题平反了）常委手里这一份材料为什么还不退走，毁掉？直到1963年阎遐知道了，报告通讯兵部才知道这么回事，派人拿来平反决议，把原错批错斗材料收回了。所谓“阶级异己分子”的材料党委都知道，但平反决议史梦兰同志前些天告诉我，他没有看到。就是说他只知道是平反了，而不知道是一场反“独立王国”斗争中的受陷害的性质。这些符合党的原则吗？这能使常委吸取应有的教训吗？

错批错斗的请示报告，没经本人看过，没经总政批准，就散发到地方学校，

本身是违法乱纪；常委接到材料，既不向市委反映，也不找我谈话告诉内容（我同阎遐都不知道），张学书、伊敏同志就找我谈话要我同阎遐划清界限，我说等弄清问题性质再划不迟。这是些什么作法？陆平同志在十三陵谈话中曾讲“阎遐来京时，他们学院向学校打招呼”。最近老史告诉我1961年至1962年阎遐回家时，“我应把阎遐的活动向学校反映”，这不是违法乱纪吗？北京有部队、有高级领导机关，两个院校不是一个系统，没有任何组织关系，怎样能这样做呢？发生这些违反原则的根本原因，我看是因为陆平同志和他们学院犯错误的党委书记是老熟人，而陆又对我屡提意见有反感，双方不讲原则的错误就结合起来了。但奇怪的是我们常委、监委同志为什么不提出疑问、批评和反对？今天应该把这件冤案在我们这里的影响加以澄清了，教训也应该明确了。

第四件事：关于我的档案丢失问题：1958年学校发现我的档案丢失了，问我，我说我没见到过，很着急，请组织查找，并提供了我各个时期的证明人。一次，大学工作部赵斌同志告我市委组织工作会议上，批评了有的人事处长丢失了自己的档案，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武断的反映问题？这不是使上面怀疑我这个人的政治品质或思想品质吗？这件事不知道和以后免去人事处长职务有没有关系（过去我一直是从因要调动工作去考虑这一问题）？陆平同志解释为什么调动我工作时，曾说这不是“打闷棍”。最近我才知道陆平同志还私下告诉石幼珊同志准备要我到技术物理系，当行政办公室主任，因石顾虑我老一点而作罢。是事实的话，请想一想这合乎干部政策和组织手续吗？这是正派的做法吗？为什么改变我参加革命以来就做党政工作？大概是市委批评了，学校又发了些不知怎样写的调查信。几年来，许多老熟人见了面冷淡得莫名其妙，有的见了是躲之唯恐不及。总算好，1963年伊敏告诉我档案找着了，五六年里都压在党委办公室的一般文件柜里，据说是因为江隆基同志亲封的文件，几年来，没人敢动（？）但为什么不寄给江隆基同志或写信问一问里面是什么呢？这种不负责任使别人忍受几年痛苦恐怕难以原谅的吧？以后党委有没有向市委写个检查报告，使市委有关部门了解这件事情真相，在一定范围说清呢？又有没有向发信调查我的情况的人，说明档案已找着，责任不在本人呢？

第五件事：关于在反革命李泽成问题上“抓老修”的问题：我们五年级出了个反革命学生李泽成，入学前是个党员，1960年发现他散布一些反动言论，请

示党委，1961年列为专案，1963年逮捕。逮捕后我们三次请示党委要在群众中批判，肃清他的影响，奇怪的是常委都不同意，或说还没有结案，或说怕惊动了其他（？）特别奇怪的是尔联柏答复我，不批判是为了“抓幕后操纵者”，陆平同志十三陵会议后期找我集体谈话，也说是为了“抓老修”。所指的是谁，如何抓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总支书记。九评学习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再不批也不行啦？批了，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线索。请问陆平、尔联柏同志，你们所指的“老修”“幕后操纵人”是谁？也请常委有关同志想想，一直拖着不在群众中肃清影响究竟有什么好处？那不是故意保留疑案提倡无根据的政治猜疑吗？

李泽成列入专案后，几年保卫部门从不同我配合，没同我谈过案件工作情况，这案件究竟有什么教训？党委、总支有些什么责任，应该有一结论性意见。

第六件事：关于陈哲夫同志文章批判和政治系干部团结问题：1960年党史教研室教员陈哲夫写了一篇“陈独秀剖析”的文章，从陈独秀过去文章的只言片语中，肯定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的“作用”。这就违背了中央历次决议，违背了主席思想，实质上是为陈独秀翻案的一篇文章。开始没发现，后来“历史研究”杂志来信给学校，谢道渊同志通知我们：“陈哲夫文章外边批判了，有人说为陈独秀翻案，要我们进行教育，但要不提‘为陈独秀翻案’这句话。”我们当即组织总支扩大会议进行批判，指出“文章脱离主席思想，违背中央决议，方法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因此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陈当时不服，只检查了骄傲自大、标新立异。后通知全体教员看看这篇文章，准备讨论，并把会议情况告诉谢道渊同志，谢要我们再研究一下“问题的性质”。后因陈下乡整社，教员也没提出问题，就这样压下来了，我们没有再抓这件事。十三陵会议戈华同志为此事“大吃一惊”，并追查了其他三篇文章以及同我们系领导关系，开始还怀疑有什么政治性小集团。把事实查对后，才明确责任在党委上边。又是上边的问题不检查，反而抓下面。

顺便说一下常委确定的政治系领导整风的第三个题目：系的干部团结问题，我不否认我思想修养上有些盲目自满情绪，政治上的优越感等缺点；也不否认政治系干部中有些原则和非原则纠纷影响团结；也不否认我没把赵宝煦、高作民同志团结好。但是请常委，特别是陆平、戈华同志想一想，从你们起，就一直对我政治上不信任、抓辫子，准备在整风中“倒下去”，有什么团结的愿望？又有什

么坚实的团结基础？赵宝煦、高作民同志情况你们了解过没有？你们抓了几年我们的团结问题，为什么不指出影响团结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戈华同志参加了会议不认真主持解决问题？

第七件事：我被批判挨斗争的五年级问题：五年级情况还没弄清，就错误的追究总支责任，批判总支书记，这是工作组同志按着张磐石同志错误指导思想，高作民同志等错误介绍情况下所形成的错误，工作组同志已经进行检查，这里不再多说了，我只说党委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

五年级是一个以工农子弟为主的班，几年来基本表现是好的，党团支部在学校党委系总支领导下，几年来，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没有烂掉过，成绩是主要的。这个班除按教育计划进行教育外，经过三面红旗教育、反修教育，艰苦朴素传统作风教育，多次的世界观教育，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尤其1962年十中全会公报公布后，进一步组织学习了主席关于过渡时期阶级，阶级斗争指示，1964年九评革命接班人教育等，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党团支部整顿也有一定成效；前后一年半以上时间参加校内外六次劳动，两次农村四清，多数受到表扬，两次四清反映都比较好，这次市分团委都比较满意，认为是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不愧是党培养的工农子弟，学校五反后，班上都有针线包，自己理发等。这个班问题也是严重的，入学不久发现两起偷盗行为，出了一个反革命。1962年由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扑，披着党员外衣的反革命李泽成的捣乱破坏，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支委领导一度涣散；少数同学议论大跃进缺点（个别一度立场动摇、有攻击三面红旗反动言论），八、九个同学谈恋爱（个别行为恶劣），这些都作了处理，进行了教育，当时由于我们对阶级斗争的形势认识不深，对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有就问题解决问题的情况，这些都是具体工作上的缺点错误。

十三陵会议上，高作民同志在我一次听少奇同志报告没参加的小组会上，提出对五年级一团糟的看法，戈华同志当场提出“是不是烂掉了”的问题。一场人为的斗争就从这开始，回学校后，常委确定五年级问题是我们系领导骨干整风三个重点之一。就这样断断续续小会批了我几个月；戈华同志一次还说“这次整风有人要倒下去”，显然是以敌我矛盾来看待的。工作队来后，学校介绍政治系是全校八个重点系之一，骨干积极分子是高作民，问题还是那三个。我原盼望工作

组来后帮助解决问题，没想到倒使问题发展到吸收非党学生、非党干部参加五十多人的大会批判。但斗了也有好处，把问题明朗了，我也有为五年级同学和自己说话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一致说五年级是个好班，没有烂，成绩是主要的了。当然具体工作上几年来缺点错误不少。这场历时十个月两个阶段的错误斗争，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在十三陵错误的被高作民同志提出来；常委同志听了高的意见后，不找我同总支同志三头对面谈一谈，议一议，也不下去蹲点了解情况，片面的支持高作民同志错误意见，把问题扩大了；又被工作组同志错误的处理了。我讲的特定情况，就是学校主要负责同志长期对我政治上不信任，抓政治辫子，特别陆平同志对我的打击报复，政治陷害，所形成的周围同志对我有些怀疑的气氛。十三陵会议是整下不整上，“抓大鲨鱼”的；五年级问题是几年来企图在李泽成问题上“抓老修”的继续。

我讲这些情况和意见，是想提请常委同志正视一下我们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情况，集体领导情况，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在某些问题上执行原则的情况等究竟怎样？也就是说我们维护党的原则，维护原则的团结怎样？如果我们不首先解决党委核心的原则斗争和团结，我们的集体领导作用、集体的智慧就无从充分的发挥。

同时也是想提醒陆平同志正视一下自己思想品质的另一方面，1月6日错误的党委扩大会上，你的检查推翻了，但我看当中还是有些切合情况的真实检查。比如，你说自己搞个人领导，有家长制作风，把北大看成自己小天地，压制批评，怕揭错误；不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而是放在群众之上；自己是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根没扎好，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又受侵蚀等。对照你工作中情况和某些行为看，属思想范围的检查不是重了，而是在自觉程度、深度上都还显不够。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要全校兴无灭资，首先就得我们挖掉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和地主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要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首先就要我们身体力行地做出表率吧。

因为多从个人感受上来谈常委情况和意见，难免片面，但还是本着对党的事业对同志负责态度提出来，作为我们检查党委领导的一部分意见。

【资料】

张侠同志给刘仰峤和九人小组的信

1965年6月15日

刘仰峤同志，并转九人领导小组：

前些天我写了一个发言稿因没有讲的机会，为使组织了解，先送给许立群同志和你。想已看过。前两周学校党委讨论了两次几年来工作总结报告稿，我满以为得到一个讲话的机会了，就根据议题又重新组织了一个发言，准备下次党委会上讲的，没想到讨论刚刚涉及党委领导，又碰上突然宣布运动中中断两个月！

几年来，我深感给学校领导提点有分量的意见，确实不易，就连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来也不例外，运动至今，别说三级干部的民主大会没开过，连党委会全会也没放手让大家说说话。我作为系的干部，也被错斗了，但对领导上一肚子意见，却没机会讲！两个月以后，究竟能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说实话，我是没多大信心的，也许到时工作队还没有全部撤走，又有去年十三陵“整下不整上”的教训，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我的意见压在心里已经好几年了，这次又是这些意见引起的五年级问题被斗的，系工作组要撤走了，必须弄清楚它！再加上其中有些问题现在还在起着它不好的作用，所以我请求工作队把它连这封信作为群众来信在工作简报上印出来，或者单行印出，分送领导小组和学校常委同志，党委委员，听听我们的意见，会有好处的。最好再能送市监委、高教部各一份，总政治部一份。前者1963年我都曾去申诉过；后者因我爱人曾属那里管理，有必要向他们继续反映些有关真实情况。（附意见书一份）

致

敬礼

张 侠

1965年6月15日

【读者来信】

谁能告诉我几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您们好。我是在欧洲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目前正在鲁汶大学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同时在《记忆》打工，帮着方老师干些编辑工作。

我正在写一篇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内容是关于五十年代初期（1949--1956）新中国的社会生活与语言的互动。我想从分析五十年代初的语言说起，所以自拟了十几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和短语：新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苏联老大哥、工农联盟、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文艺整风（批《武训传》）、电气化、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土改、互助组、合作化。

请国内的老师和朋友，帮我把把关，出出主意：

- （1）上面这些词和短语算不是关键词？
- （2）还有哪些词和短语应该补充进来？

[来信请发到 fangxc1966@gmail.com](mailto:fangxc1966@gmail.com)

十分感谢。☺

续霜红 2022-10-5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